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9

1976

上海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苏联哲学 ·

苏联的走资派哲学 靳 海 (1)

现代辩证法 [苏] И. И. 费多谢耶夫 (5)

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 [苏] И. И. 费多谢耶夫 (24)

苏联哲学动态

苏修加强对哲学界的控制 (33)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研究国家机关的改革问题 洪 叶 (35)

苏联社会的性质 [美] 保罗·斯威齐 (39)

再论苏联社会 [美] 罗斯·甘迪 (51)

· 苏修在古巴的扩张 ·

古巴：一个神话的破灭

从反帝的革命战士到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

..... [美] 《革命》周刊编辑部 (56)

卡斯特罗和古巴的苏联之路

.....〔美〕爱德华·冈萨雷斯 (80)

同赫鲁晓夫摊牌〔美〕肯尼思·奥唐奈等 (89)

* * *

信件的经历〔东德〕《新德意志报》(117)

创价学会的现状〔日〕杉森康二 (119)

中国人在美国威廉·L·董 (127)

外国史学家简介

修昔底德 (142)

国外书评

《末日》.....〔美〕《号角》周刊 (146)

美国大学中研究苏联问题的一些机构 (148)

目 录

· 苏联哲学 ·

- 苏联的走资派哲学 靳 海 (1)
- 现代辩证法 [苏] И. И. 费多谢耶夫 (5)
- 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 [苏] И. И. 费多谢耶夫 (24)

苏联哲学动态

- 苏修加强对哲学界的控制 (33)

·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 研究国家机关的改革问题 洪 叶 (35)
- 苏联社会的性质 [美] 保罗·斯威齐 (39)
- 再论苏联社会 [美] 罗斯·甘迪 (51)

· 苏修在古巴的扩张 ·

古巴：一个神话的破灭

从反帝的革命战士到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

- [美] 《革命》周刊编辑部 (56)

卡斯特罗和古巴的苏联之路

..... [美] 爱德华·冈萨雷斯 (80)

同赫鲁晓夫摊牌 [美] 肯尼思·奥唐奈等 (89)

* * *

信件的经历 [东德] 《新德意志报》 (117)

创价学会的现状 [日] 杉森康二 (119)

中国人在美国 威廉·L·董 (127)

外国史学家简介

修昔底德 (142)

国外书评

《末日》..... [美] 《号角》周刊 (146)

美国大学中研究苏联问题的一些机构 (148)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现代辩证法

〔苏〕И·И·费多谢耶夫

辩证法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发展

辩证法认为，应以历史态度来看待社会现象，而辩证法本身在历史进程中也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它处于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中。如果说唯物主义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每一划时代发现、随着人类历史的每一新时代的到来而不可避免地应当改变自己的形式，那么这也完全适用于辩证法。

辩证方法的发展是在分析发展着的现实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辩证法有它自己的特点。社会主义是社会生活发展的新阶段。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和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必须采用两种特殊的方法。实际上，这是具体地历史地运用同一种方法，即运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性质不同的社会。

在马克思那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就是分析阶级斗争和分析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消灭阶级对抗的途径。这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的辩证法。阶级关系决定了对抗性社会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它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并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导致社会主义。马克思也运用辩证法来分析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在他那个时代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客观辩证法，因此，这种分析自

然带有科学预见性质。

列宁继续对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进行分析。同时，在社会主义已经变成客观现实条件下，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的辩证法观点。他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主要特征——对抗消失了，而矛盾依然存在。

至于谈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学说的发展，那末，完全有根据说，列宁及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拥护者，揭示并全面地论述了从对抗性矛盾向非对抗性矛盾过渡的规律。

为了充分地评价列宁所发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辩证规律在科学理论上和政治上的意义，应当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当具体探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规律性，以及当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径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生活的客观辩证法把作为社会生活的新源泉和动力的非对抗性矛盾的研究问题提到了首位。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克服不断增长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成分之间非对抗性矛盾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对抗的手段，是建成社会主义、镇压和消灭与社会主义敌对的阶级的手段。随着社会内部对抗性矛盾的消灭和社会在社会政治上的统一的确立，随着城乡国民经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从内部发展的需要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已不再是必要的了，并转变为全民国家。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全民国家的辩证法，从认识论上来说，是同不懂得从对抗性矛盾过渡到非对抗性矛盾的辩证法相联系的。

社会主义发展的辩证法

如果不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的辩证规律性的具体表现，就不能懂得和了解现时代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并不是辩证法的局部的、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不仅具有自己的特殊规律性，而且，它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已经具有为整个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征。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根本改变了，出现了社会发展的新动力和源泉。

随着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人类进步的无限可能性。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巨大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

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世界竞赛中，资产阶级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效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某些成分和加强生产的社会化。社会主义国家从自己方面来说，也不拒绝考虑和利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在组织企业工作和实现技术进步方面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某些经过改造的、发生质变了的商品、货币经济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只有对教条主义者来说，才是只要一谈到物质利益，更不要说利润了，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竞争和追求利润是特定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我们主张企业的赢利和利润，而且这应当成为经济管理的最重要的准绳。因此，应该尽量地利用这些同社会主义本性相符合的经济杠杆。

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赛中用来赢得胜利和最终胜利的主要武器，是新的经济制度和新的社会关系制度。正是在这种

制度中，蕴藏着资产阶级社会所不能有的无限进步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研究生活的新形式，进步的新动力和源泉，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新的刺激因素和新方法，经济组织、制定计划和进行管理的更高形式，是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的主要任务。

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特点不但表现在动力的性质上，而且也表现在矛盾的新类型和解决矛盾的新形式和新方式上。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及其克服的形式和特点是什么呢？首先应当强调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社会内部对抗性矛盾消失了。

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作为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是起作用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政治上的统一，完全不排除矛盾和对立面的斗争。但是，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却同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表现不同，它具有完全另外一种新的特征，跟它在资本主义和在其他阶级对抗形态中的表现根本不同。

“对立面”、“矛盾”、“对立面统一”、“对立面斗争”等等概念本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着质上不同的另一种内容，也就是说，把它们具体运用于社会主义与把它们运用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只要指出下面一点就够了：如果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双方的斗争照例是导致一方胜利和另一方灭亡，最终导致该社会结构的消灭；那末，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的克服则导致社会在社会政治上的统一的加强，并成为它发展的动力。

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随着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消灭；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抗，于是阶级斗争也就不再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了。

为新与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所制约着的那种常有的发展的

中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被另一种解决矛盾的形式所取代，例如扬弃或在保持其基础的情况下根本改造这种或那种社会制度。这种解决矛盾的方式，比起破坏来说，在不可比拟的、更大程度上包含着继承性和向事物的新质的过渡。

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特点是矛盾在差别阶段，即在它们转化为社会冲突之前，就能够解决。与这一规律性相适应，采用强制方式解决矛盾的范围缩小了。这样就开始逐渐实现马克思的预言：当社会再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时，“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①。

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那种解决其现存的或新产生的社会矛盾的机制，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即它是一种质上崭新的现象；社会生活矛盾的解决有利于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个别阶级或社会集团，而是整个社会。

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上的对社会的灵活机动的管理，发现现存的或再产生的矛盾，及时选择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方法，大大地限制了解决矛盾的自发作用，使社会、工人阶级及其作为社会领导力量的政党的整个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自觉性。

在这种条件下，解决不同矛盾的最重要形式，是国家和党为社会利益而采取的改革措施。作为解决矛盾和防止产生冲突形势的方法，作为最充分地利用在矛盾斗争中产生的动力的一种手段，这种改革特别明显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

可以有充分根据地说，辩证分析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积极态度对待生活的实际过程。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从革命实践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规律性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范例。这种分析的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版，第161页。

点在于：不是在凝固的、静止的状态中，而是在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中来分析矛盾，因为这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只有分析矛盾的运动才能揭示矛盾的相互转化，揭示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的相互联系，揭示矛盾的趋势及克服矛盾的方式的特殊性。辩证法不是用来收集矛盾和对矛盾加以分类，而是用来确定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如果对现实抱积极的态度，那末，对分析矛盾的意义应该怎样看呢？

矛盾如果是现实的而非臆想的，那末，就应提出一定的任务、一定的问题及其解决的方向。不揭示迫切问题而只承认矛盾，这是一种直观的辩证法。

认为迅速增长的需要与生产发展水平不高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甚至是整个共产主义形态的基本矛盾，这种看法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当然，这种矛盾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过去和现在都是存在的，它特别表现在那些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里。

但是，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认为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呢？

第一，不能把这种矛盾同剥削社会里在历史上不可避免的群众消费匮乏混为一谈。

要知道，在这种混淆情况下，就会把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需要宣布为社会主义的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始终是历史进步的基础。而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不是消失了而是尖锐化了。

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尽管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产的增长却使统治阶级大发横财，而且这种增长是

靠剥削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掠夺经济不发达的附属国人民和靠他们的消费匮乏来实现的。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矛盾的对抗形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群众的消费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增长。这是新的历史规律性。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变了形式。

这种矛盾只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所具有。

第二，这种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特殊表现。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使社会之分为不同阶级成为多余的了。而社会主义的主要社会任务，即消灭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解决的。但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够高，由于这种发展有一定的不平衡性，就还存在着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这是一个历史遗产，是它们之间过去对立的残余。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保留着工人和农民两个阶级之间以及他们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别。他们之间的进一步接近，向完全的社会单一性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一个规律性，但这并不排除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矛盾的可能性。尽管所有社会集团的目标和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它们在生活条件、物质保障、文化和日常生活服务的水平上还有一定差别。任务不在于证明这种矛盾的不可能性，而在于不让它们产生和尖锐化，如果它们出现了，就要及时发现和加以克服。

第三，只要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和已达到的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就存在公民个人利益与整个社会利益之间发生一定矛盾的可能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和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把社会生产的利益

同人们的个人需要正确地结合起来。

把社会生产的利益同满足人们个人需要正确地结合起来，这不是自动起作用的自然规律，而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社会规律。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现在，当强大的工业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如果不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质量指标，不提高社会生产的经济效率，那就不可能有生产的进一步加速增长。

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自觉地、有计划地在科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经济组织。所以，这里特别不能容忍主观主义、肤浅的外行的领导、“任意的”行政命令等等现象。

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结合往往用如下公式来表述：对社会有利的，对每个集体和个人也应当有利。社会主义社会这个规律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激起劳动积极性、社会积极性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的结合。

只有在这种结合的基础上，社会主义竞赛这种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才能成功地发挥作用。不能把竞赛仅仅归结为精神动因。社会主义竞赛不是孤立的个人之间的角逐，而是集体成员之间，生产的、商业的和为日常生活服务的企业公司之间的竞赛。它是在公有制和在按劳分配条件下，为增加生活资料而斗争的集体形式基础上进行的。因此，不对获得良好劳动成果的人们给予物质的和精神的奖励，竞赛就不可能得到发展。

社会主义社会里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是极为多种多样的，就其性质和表现的尖锐程度来说，也不都是一样的。它们既表现在经济范围内，也表现在社会关系和思想生活领域中。在这些领域里，矛盾及其表现形式的范围也是极其广泛的。在精神生活领域——从科学问题上的友好争论到同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

余和敌对思想影响进行尖锐的斗争；在社会关系领域——从同志式的竞赛到坚决消除诸如官僚主义、犯罪行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生活准则、压制批评、民族纠纷的残余这样一些反社会现象的斗争；在经济领域——从同个别企业中的失算到破坏国民经济中最适当的比例的斗争，从克服劳动的物质刺激制度中的缺点到同投机倒把、盗窃和侵吞公共财产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矛盾并不都是不可避免的。其中许多矛盾是由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组织工作、社会事务管理工作中的缺点才产生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有计划发展的可能性得到更充分和更正确地利用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是可以避免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没有阶级对抗和与之相联系的对抗性矛盾的基础。

但是，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与对抗无关。在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存在着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才能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中没有内在的阶级对抗。但是，在社会和反社会的犯罪分子之间，斗争则具有对抗性质。如果把社会同杀人犯、强盗、小偷、公共财物的贪污犯、叛国者的关系看成是非对抗性矛盾，那是不恰当的。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否则，就得认为，社会不是由社会集团构成的，而是由守法公民与犯罪分子构成的。这样看待矛盾，就会歪曲对社会的社会结构所应采取的科学态度。

社会主义的辩证法，是巩固社会在社会政治上的统一和在这种统一条件下克服矛盾的辩证法。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和友谊，各民族和部族的友好合作都在不断地加强。

对立面统一和斗争学说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在反对改良主义理论家时强调指出，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均势是相对的、暂

时的、易逝的，而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是绝对的一样。但是，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

我们已经指出过，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矛盾来说，必须谈到对立面的结合。这指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例如劳动的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民主制与集中制、一长制和集体制、生产活动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等等。但是，在任何解决矛盾的形式中，发展都不能不经过斗争。而对立面的结合，正如消灭其中一个对立面一样，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

例如，不同平均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残余进行斗争，就不能正确地把物质利益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

但是，有这样的理论家，他们根本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某些对立面结合的可能性。然而，否认对立面结合的任何可能性，就是看不到社会主义下克服矛盾的具体辩证法。

矛盾不是别的，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辩证法要求看到对立面统一及其斗争的具体特点。生活表明，既有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也有非对抗性对立面的统一。不考虑这一点，就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辩证法和对抗性社会经济形态的辩证法。对抗性矛盾的统一必然导致对立面的冲突和火并，其间的斗争最终将导致该统一体本身的消灭。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统一，那末，当然这个统一也离不开其对立面的斗争。但是，冲突在这里不是必定要有的，矛盾的解决是在这一斗争进程中，通过该统一体的两个不同方面的进步因素的发展和完善、两个不同方面的相互渗透来达到的。

社会主义的非对抗性矛盾的特点，在于它们可以有计划地、自觉地调整和控制。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有计划地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即按矛盾的客观性质自觉地调整和控制对立面的斗争。

当年，列宁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论战时曾解释说，他们把对立面，如民主与一长制，生产和分配中的平均制和重点制，也就是把平等的一般原则与对从事重点的、生产率高的工作者的优先照顾，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

在揭露托洛茨基分子这些理论上的重大错误时，列宁说：“决不许制造糊涂观念，制造危险，使人们弄不清楚什么时候需要民主，什么时候需要一长制，什么时候需要专政。”^①

接着，在分析对重点劳动给予物质方面的优先照顾和平均制的相互关系时，列宁说：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要想办法把重点制和平均制结合起来，而这两个概念却是彼此排斥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多少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懂得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而重要的是，在我们三年半的革命期间，我们在实践中已经不止一次地把对立面统一起来。”^②

领导的艺术，在于不忽视矛盾和不否认对立面结合的可能性，在善于及时发现矛盾，如果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质的，就要找到把对立面和倾向结合起来以及加以克服的形式和措施，及时采取措施来消灭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倾向，即对抗性矛盾。

关于统一物分裂为两个对立面的辩证法学说，绝不意味着要使这些对立面永存。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同它以前的辩证法形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为克服对立面而从事自觉的、目的明确的和科学地组织起来的斗争。对抗性矛盾是通过消灭那些阻碍历史进步的对立面来克服的。

非对抗性矛盾（其中包括历史上曾同社会之划分为阶级相联系的矛盾）的克服，具有另一种性质。例如，在所有对抗性社

^① 《列宁选集》第4卷1972年版，第410页。

^② 同上书，第411页。

会形态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却被统治阶级用来对劳动群众进行剥削。但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划分即使在剥削阶级消灭之后，仍然会长期存在。怎样克服这种“统一物的分裂”呢？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其克服是不能通过消灭脑力劳动或体力劳动来达到的。马克思主义对这个问题及其解决的前景作了辩证的阐述：随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将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按其性质和过程来说，根本不同于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如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是通过革命实现的，即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为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所代替。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则是在一个社会形态范围内的过渡，是向无阶级社会、向完全的社会单一性的过渡。这时，任何阶级的政治统治的一切痕迹都消失了。随着阶级的消失，作为社会政治组织形式的国家也就消亡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形成的全民国家，将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的社会自治。

可不可以把这个过渡看作是质变和社会飞跃呢？毫无疑问是可以的。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社会生活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虽然这个过渡是逐渐实现的，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社会发展的飞跃。

由此可见，社会过程的辩证法为新型的质变所丰富。这里，特点在于：渐进性不仅成为量变的形式，而且也成为质变的形式，成为实现社会飞跃的形式。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渐进性和飞跃处于辩证的统一中，这种统一是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的过程的结果。

阶级利益对立和阶级对抗的消失，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发

展的形式和社会发展过程的性质。从这时起，社会的进化就不再是政治革命了。

科学共产主义的迫切问题

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总结革命改造社会的现实过程、总结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形成过程的基础之上的。在分析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阶段和形式，以及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

近年来，对社会主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的社会学研究的工作加强了。学者们致力于分析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规划和预测问题，以及研究思想过程和社会心理学问题。

同时，在苏联和兄弟国家学者的研究工作中，对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和共产主义观进行了论据充分的批判。例如，驳斥了一种反科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否认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独立阶段的历史规律性，并把社会主义包括到过渡时期中去。关于社会主义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提法，也没有得到赞同。

生活证实了并正在证实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理论的正确性。按照这种理论，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确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共产主义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将经历三个质上相互区别的历史发展时期：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本身。

在苏联科学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是作为一个必然历史发展时期来阐述的。这一历史时期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确立开始到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消灭私有制和人剥削人制度，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为止。

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结果。基本建成社会主义是指建成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全部基础，而不仅是指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过程不能只归结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胜利。

苏联学者把社会主义看做是稳定的、质上一定的社会状态，它有着自己独具的性质。社会主义根本不是不成熟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胎记”的暂时共存，而是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具有统一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一种社会制度。作为共产主义形态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有一系列共同的特征，因为这个社会是建筑在集体主义原则和公共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的。同时，社会主义就其社会经济结构和物质技术基础的性质来说，又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有根本区别。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形态的特定阶段，但不是一个短暂的阶段。社会主义形态的长期性提出了关于其阶段的问题。在苏联科学界现在居统治地位的看法是，在社会主义阶段的范围内起码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开始，到建成成熟的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止。在苏共文件和兄弟党文件中，这个阶段被称为巩固、发展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目前，社会主义友好各国大多数都处于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那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取得了胜利，过渡时期结束了，以现代工业技术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建立起来了。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和最终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全民国家。

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巩固及其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是科学共产主义领域中占主导地位的重大课题。苏共二十四大阐明了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同时提出了今后理论研究工作和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许多方面的任务。

我们认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介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某种二者兼而有之的中间物。它是达到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全面展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把科技革命成就同新的社会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在不断发展，这些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在不断扩大。运用规律所取得的社会成就越来越大。正在为个性的全面发展创造有利的物质前提和精神前提。

苏联科学界极其重视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问题。现在已经可以谈到某些方法论原则。

第一，在确定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时，不能只以个别标志，譬如生产力、劳动生产率等等为依据。必须全面考虑问题，估计到所有基本因素，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能确定某个国家中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

第二，苏联科学界驳斥了那种认为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产指标中，可以抽出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标准的观点。发达社会主义的标准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是其社会经济本质所独具的，这些标准是在社会主义的各种要求的基础上形成的。

第三，应当把在保持工人阶级领导作用条件下所达到的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劳动群众及其一切组织团结在马列主义政党的周围，看作是发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准。

苏联学者从发展角度和历史前景方面来研究发达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他们特别重视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途径、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和所有社会关系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的关系等问题。

在长期的争论和大量研究工作过程中，阐明了商品货币手

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似乎商品货币形式与社会主义的本性是不相容的，尤其是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更是如此。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详尽地揭示了商品货币范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本质和作用方面所存在的根本的质上的区别。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基本原理为出发点，即一切经济范畴——商品、货币、资本，都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不是单纯的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些经济范畴则反映着根本不同的另一种社会联系，执行新的职能。

商品已经不是私人商品占有者间的关系，而是集体生产劳动者交换活动的形式和手段。劳动力不能成为商品。工业、农业、交通、邮电等国营企业以及国有土地，已不能买卖。

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货币即使在局部范围内也不能转化为资本，不论是工业资本、金融资本或者商业资本；也就是说，货币不能成为剥削的手段。

由此可见，随着社会关系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被改造，商品货币范畴的本质和作用改变了。在此种情况下，它们对社会主义来说，不是外在的异己的形式，而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分配和交换活动发挥作用的重要手段。因此，如果轻视商品货币手段，把它们看成是某种遗留下来的形式，或者只是换算形式，那是错误的。货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单是结算符号，而且是经济关系和实在劳动消耗的体现，是按劳动量领取产品的凭证。

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只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但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无可比拟的更高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学者应当全面地揭示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全世界历史意义，表明它现实是什么样的，它与以前的发展阶段有什么区别。同时要看到，

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首先就是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问题时，产生了许多争论问题。某些同志教条主义地和按引文来解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是无阶级社会的原理。从这一命题出发，一些人得出结论：只要阶级和阶级差别仍然存在，就谈不上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随着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建成，阶级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知识分子、工人和集体农民之间的职业区别或者社会心理区别。这就是从列宁著作中随意摘引和教条主义地解释个别原理的例子。实际上，在列宁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建立无阶级社会的过程区分为两个阶段，即消灭剥削者阶级和消灭一切阶级，后者同消灭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相联系。

在确定成熟社会主义阶级结构的变化和达到社会单一性的前景时，某些同志倾向于或者把整个知识分子或者把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包括到工人阶级中去。相反，另一些人则认为，应当把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包括到知识分子中去（更不要说把整个工人阶级全部包括到知识分子中去的极其愚蠢的企图了），这样便弄成只有一个阶级即知识分子了，从而似乎就解决了消除阶级差别的问题。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中发生的实际变化根本不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包括到工人阶级中去，或工人阶级包括到知识分子中去。

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对根本改变阶级结构来说，成功地解决了极为重要的任务：消灭剥削者阶级和对小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巨大的社会政治成就集中到一起，就使得我国再没有这样的阶级或这样的社会集团，其中一些人由于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而能够占有他人的劳动；

从而消除了作为阶级斗争主要基础的阶级和阶级利益的长期对抗。随着对小生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依赖的已不是不同的，而是同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这是新的阶级。确切地说，这是特殊的阶级，即劳动者的友好阶级，再没有同它相对立的剥削者对抗阶级。社会主义并不产生新阶级，而是根本改造社会的阶级结构。

社会朝着越来越具有社会单一性方向的发展，是通过这样的途径，即改变阶级和社会集团本身的状况，这种改变的基本内容是工人阶级、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他们的社会地位、劳动的条件和性质、生活水平、教育和文化水平等等，越来越接近。

现代工人阶级的发展是在生产活动中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逐渐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的过程。高度专业化的工人的数量在增长，按他们的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来说，他们已越来越接近于工程技术人员。现在，成百万的工人成了合理化工作者和发明家。这样，他们已不单纯是体力劳动者，不单纯是物质财富的基本创造者，同时还是生产领域中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至于集体农民的改造和农业劳动性质的改造，那末，这里也发生了农民与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越来越接近的过程。这里，农工综合体具有巨大意义。

总而言之，我国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说，教育培养子女的条件在改变，与不同实际条件和他们获得教育、文化发展等等的可能性相联系的那些差别在消失。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知识分子已不是独立于劳动者阶级之外的社会集团，一致的社会立场和政治思想立场把他们同工人和农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所有劳动者的兄弟般的联盟

中,知识分子为社会的文化技术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巨大贡献,这有助于阶级差别的消除。

对家庭进行的现代社会学研究,也揭示出它对社会的发展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过程。这种研究表明,当前许多家庭,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都是由不同社会阶层组成的:父亲是工人,母亲是集体农民,儿子是工程师,女儿是教员。社会的不同阶级和集团的成员在家庭这一级上相互交错,这表明从前的社会界限和壁垒在消除。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莫斯科出版的 П·И·费多谢耶夫:《现代辩证法》〔增订第二版〕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组译)

革命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靈魂

〔苏〕И·И·费多谢耶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世界观和政治的相互联系首先表现在它们都是为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服务的。当然，不能把哲学简单地说成当前的政治，用评论今天的时事代替哲学问题的研究。但是，使哲学脱离政治，把它归结为思维的抽象理论，使之与争取对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实践斗争相隔绝的任何企图，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敌对的。衡量哲学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是看它对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和科学发展所提出的迫切理论问题有多大作用。

苏联社会的前进运动，它的上升到新的更高阶段，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的鲜明表现和证明。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的、先进的、进步的、由低级导向高级的事物，同旧的、衰亡着的、落后的、拖向倒退的东西还在进行斗争。在物质生产领域，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革新者通过同陈腐观点和习惯的代表人物进行斗争，开辟着前进的道路。在文化发展和人们的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共产主义因素同不健康和有害的倾向、同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同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

只有形而上学者才会不注意，或者甚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矛盾。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新事物也是在同旧东西的斗争中诞生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抓住旧东西不放的教条主义者

和保守主义者才会害怕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困难。要知道，这主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前进中的矛盾和困难。比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着需要的不断增长和生产所达到的水平之间的矛盾。全部问题在于，不是去虚构矛盾，而是揭示实际生活中矛盾的发展，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法，求得矛盾的及时克服。

所谓的无冲突论曾经在我们这里盛行一时。这个“理论”的出发点是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可能性。“无冲突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严厉批判并被摒弃，但某些科学、文学和艺术工作者却产生了一种公式化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把冲突看作类似资产阶级社会那样的社会基本力量的对抗。对那些反对把旧社会的对抗性冲突机械地搬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人，他们则称之为“粉饰太平的人”。

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家不能忘记，自从剥削阶级被消灭和人民在精神上政治上的统一确立以来，社会矛盾的性质，不仅同资本主义相比，就是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相比，也发生了根本的质变。在社会主义建设最初几个阶段，当时还存在着剥削阶级的残余，它们对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有一定影响，并且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这时矛盾可能带有对抗性，而阶级斗争可能尖锐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发展对抗性矛盾的社会基础。如果说，在过渡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经济成分的情况下，矛盾还主要表现在不同社会阶级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上，那末，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被提到首位的则是各阶层居民都希望解决的那些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最有效地利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和一切资源，以便尽快地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使人民福利不断提高。解决这个问题，在苏联社会不同

社会集团——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职员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对抗。但是，在新任务、新要求同旧形式、旧工作方法之间，却可能而且经常发生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不同集团当中都会有而且确实有革新者和个别保守分子。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社会的冲突——这是局部的、暂时的冲突，不会引起任何普遍的社会对抗。不了解这一点，就意味着把局部、个别当作一般。

社会主义社会某些集团之间、整个社会及其某些成员之间存在的矛盾——这是新与旧、先进与落后、成长着的与衰亡着的事物之间的普遍矛盾的反映。全部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种矛盾整个说来不是对抗性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个别冲突不会转化为各种基本社会力量，即社会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普遍冲突。

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意看到辩证法原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起作用的这种独特性。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要人们相信，没有反对派就没有辩证法。辩证法的这类“朋友”不可能了解，社会主义制度下对立面的“斗争”不是表现在各阶级及其政党的冲突中，而是表现在先进的、成长着的、生气勃勃的、上升的事物同所有那些正在衰亡和代表着过去的东西的创造性竞赛中。

社会发展规律的自觉运用

现在，为了说明社会生活中发生的过程，迫切需要研究这样一些新问题，如在世界范围内互相排斥的对立双方的共存和斗争的问题，以及解决这种对抗的方式问题。

不能不注意对立面统一和斗争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

作用的特点。列宁早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就注意到这些特点，指出了忘记这些特点的危险性。他写道：“对抗和矛盾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①。

研究列宁所发现的从对抗性对立面过渡到非对抗性对立面的规律是对辩证法理论的巨大贡献。

因此，就产生这样的问题，即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怎样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来克服对立面的问题。例如，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正是通过两种劳动的结合（融合）来进行的。很明显，问题的这种新提法在创造了新的社会条件下才成为可能。因为在被阶级矛盾所分裂的对抗性阶级社会里，谈论对立面的结合（融合）——就意味着陷入机会主义。但是在我们国家里，对抗的阶级已经消灭了，不仅可能，而且应该产生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来克服某些对立面的问题。这是我们新的社会主义现实所提出的迫切问题。

只谈“统一物分为两个部分”，只谈“斗争”，不谈对立面的统一和互相渗透，这个公式不仅使理论粗俗化和简单化，而且导致对现实作出不正确的结论，妨碍理解对立面克服的过程。这个公式曾经成为社会主义胜利后阶级斗争尖锐化这个论点的一种“论据”，现在又被列宁主义的敌人在他们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社会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统一的论断中加以利用。

同时，对辩证法的解释还存在另一个极端，即夸大对立面的同一、统一的作用，忘记对抗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在非对抗性矛盾的基础上也会有斗争尖锐化的可能性。把对立面的“同一”、“统一”绝对化，削弱它们的“斗争”——这是导致曲解科学成就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页。

和社会生活过程的形而上学的复活。

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分析社会主义制度下辩证规律性的具体表现，对于研究辩证法具有特殊意义。

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新社会建设的不同阶段。在刚刚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有敌对阶级分子的国家里，还存在着对抗性矛盾，阶级斗争以各种形式继续着。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的国家里，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建立共产主义基础已成为直接任务。进步的主要来源是通过有计划地在科学基础上调节社会的进步，来克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非对抗性矛盾。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使其中每一个国家都能够最合理最充分地利用本国资源，发展生产力。

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发展，同世界上一切过程一样，是辩证地进行的。这就是说，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发展中也有它的矛盾和困难。

必须注意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水平，这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能在一年之间，甚至两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拉平。不能不考虑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有不同的结构，不同的居民阶级成分。在我国，剥削阶级早已被消灭，而且这个消灭的过程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发生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是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过程中被消灭的。其后，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和国家合作社商业的发展，城市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被排除，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则在集体化的基础上被消灭了。在其他国家，这些过程的发生又是另外一种形式。在不同的国家，消灭资本主义成分和建立社会的

社会政治统一的过程处于不同的阶段。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也应该注意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文化生活传统的特点。

社会主义——这是社会生活发展中的新阶段。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仿佛分析资产阶级社会辩证法和社会主义辩证法要用两种特殊的方法。实际上这是具体地历史地运用同一种方法去分析性质不同的社会形态。

不久前，在部分哲学家当中进行了一般的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下一般说来有没有主要矛盾；如果有，其他矛盾怎样共同从属于这个主要矛盾。这实在是相当抽象的争论。在试图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差别时，也出现了简单化现象。某些哲学家提出了两种辩证法的论点。他们把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称为“对抗性的辩证法”，而把社会主义社会的辩证法称为“和谐的辩证法”。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产阶级社会为例进行探讨的辩证法，对于理解历史过程的全部辩证法具有原则意义。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辩证法只用于分析阶级斗争和在消灭私有制基础上消灭阶级对抗的途径。马克思曾把辩证法用于分析未来社会——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是，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的客观辩证法，所以这种分析自然带有科学预见性质。

列宁针对帝国主义时代继续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同时，他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客观现实条件下，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的理解。

非对抗性矛盾这一科学概念，不是以不要“对立”概念的某种“和谐辩证法”来代替作为发展基本规律的对立面斗争。如果否定对立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妄图以“差别”范畴或其他概念来代替“对立”范畴，那是错误的。当然，矛盾的产生也跟差别有

关。这是辩证法的起码常识。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有非对抗性的对立。

如果认为在我们这个消灭了对抗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发展没有斗争，不用克服矛盾，那是不正确的。矛盾永远是包括社会进步在内的前进运动的动力。我们应该深入具体地研究我们生活中的现实矛盾。但是，谈到研究矛盾，还应该指出，某些教条主义者不去全面研究矛盾的性质及解决矛盾的规律性，而是致力于记述这种或那种矛盾，甚至人为地搜寻矛盾，从而在对待矛盾上以小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观点。

必须区别马克思主义对辩证法的理解和小资产阶级对辩证法的理解。小资产阶级，照马克思的说法，把矛盾神化。全部问题在于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由矛盾构成的。它把矛盾收集起来，并且力图使对立面平衡或者使其达到和谐。然而任务却在于揭示生活中的现实矛盾，并加以克服。

一般把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区别开来。但是，在这方面不能陷入公式主义，对抗有各种各样的并且总是具体的表现。非对抗性矛盾也在变化，并可能消失；如果不遏制使其活跃的条件的话，也可能尖锐化。

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克服非对抗性矛盾，有它的阶段和相应的形式和方法。比如，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已经具有非对抗性质。但是在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这种矛盾就日渐消失，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质变，这些阶级的联盟巩固了，虽然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和某些矛盾。随着社会主义的完全和彻底胜利，各个阶级的进一步接近正导致阶级界限的完全消灭、以往矛盾的一切痕迹的消失。

所以，要辩证地对待矛盾的发展和克服，避免教条主义的公式主义的任何干扰。

对社会主义阶段的阶级的教条主义的理解表现在：大肆宣扬，似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阶级斗争必然尖锐化，而且最低限度要延续一二百年，也许时间更长。

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歪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剥削阶级已被消灭，主要问题是要保证所有社会阶层进一步团结在工人阶级周围。当然，同异己分子的斗争还在继续，并且这种斗争具有和可能具有尖锐性。我们说异己分子、资本主义残余，这不能归结为过去的影响。异己分子所反映的不仅是过去的影响，而且还有活生生的资本主义的影响。因此，同他们的斗争，自然不能从议事日程中取消。这种斗争还要继续下去。然而，主要的问题是巩固社会在社会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

人民的统一是共产主义的伟大动力

苏联人民在社会上和思想政治上的统一是使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的发展异常迅速的强大动力。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的条件下，全体劳动人民的统一日益巩固，阶级界限——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以及这些阶级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正在消灭。

历史经验证明，仿佛社会主义胜利后，随着社会向新的成就进展，国内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尖锐化，这种论点是毫无根据的。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所以尖锐化，是由于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对社会主义建设拼命反抗。在消灭这些阶级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日益加剧的条件就消失了。当然，即使

在这以后，也不排除在这个或那个国家里来自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反抗的加强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但是，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向共产主义的顺利推进会导导致人民统一的巩固，这可以认为是一般规律。

对抗性矛盾的经济基础的消失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特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对社会主义来说，不能认为对立面的斗争尖锐到彼此发生冲突的趋势是普遍和必然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克服矛盾，才不致发生社会危机和冲突？

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在于：矛盾是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基础上，全民所有制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摆脱了阶级对抗的社会在社会政治上统一的环境中发展和被克服的。

历史经验证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社会里，对抗性矛盾是起决定作用的，这类矛盾在其发展进程中会导致对立面的斗争尖锐化，引起社会的危机、动荡和崩溃。

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社会各阶级和集团之间的距离和界限日益缩小，向着完全的社会单一性、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利益的对立越来越尖锐，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人民知识分子根本利益的共同性正在增强。

(摘译自一九七一年苏联出版的П·Н·费多谢耶夫：《共产主义与哲学》〔第二版〕一书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译)

苏修加强对哲学界的控制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苏修《真理报》以《苏联哲学家的崇高职责》为题，发表了长篇的编辑部文章。这篇文章在大肆吹嘘苏修哲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以后，尖锐地指责苏联哲学界存在的种种“重要缺点”，特别是点名批判了苏修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工作，责备它“对此负有很大责任。”

《真理报》编辑部文章集中指责苏修哲学界对“一系列重要问题，没有进行目的明确的研究工作，”责成哲学界集中力量，“目的明确”地为苏修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理论上的论证。

《真理报》所谓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指的是苏联哲学界对“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所提出的许多紧迫问题，研究不力”。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紧迫问题”之一。《真理报》文章还抱怨苏联哲学界“到目前为止，没有写出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有价值的著作”；认为“作为国家的哲学首脑机关的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对此负有很大的责任。它的工作，同它所拥有的可能性和它所面临的任务是不相称的”。《真理报》对《哲学问题》、《哲学科学》等专门的哲学杂志，下令它们的“工作也需要认真地改进。其编辑和作者必须对马列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深刻的探讨，保证发表的文章具有高度的思想理论质量。”《真理报》文章在最后，还再次动员苏联哲学界撰写“大量”反华文章。

在《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发表以后，苏修《哲学问题》杂志在去年年底开辟了《苏联哲学科学的紧迫问题》专栏，并在今年第一、二期，连续发表两篇社论，继续指责哲学界中存在问题。

《哲学问题》杂志在社论中表示，“《哲学问题》杂志编委会和编辑部将好好认识这些劝告的非常重大的意义。”同时，进一步指责哲学界，认为“特

别不能容忍经院哲学、抽象化和理论上轻视当前社会实践产生的新问题”。强调“哲学问题不是哲学本身纯粹内在发展的结果”。要求苏修哲学家“从理论上领会党的政策”，“从思想和哲学上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批评哲学界有“追求某种个人垄断的野心和宗派主义的表现”。警告哲学家们必须“遵循党的原则”，更好地为苏修政策服务。

《哲学问题》杂志在今年第四期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所谓“哲学科学方面迫切问题”的选目录，要求哲学界研究这些选题，紧跟苏修的内外政策。在这些选题中，特别突出的是要求从各个方面研究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问题；直接为苏修侵略扩张政策制造理论根据的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际合作”、“社会主义世界体系”问题以及反华问题等等。

（詰 弁）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苏联社会的性质

〔美〕保罗·斯威齐

我在《每月评论》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号中，对夏尔·贝特兰论苏联的新著第一卷的前言作了概括和简单的评论。这里我将要对这本书的其余部分中所涉及到的一些主要论点，提出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问题。

推翻旧的权力机构、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每一个真正的革命有两个方面的目的，即推翻旧的权力机构和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前者为后者开辟了道路，但是它并不保证后一任务将成功地完成。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还有赖于在革命过程中，取得政权的新因素的力量和认识——当然这也同那些需要克服的障碍和失败了的但远远没有消亡的旧社会的支持者的反抗有关。我认为贝特兰的主要论点可以正确地概括为：在俄国，由于革命力量太软弱，并且基于非常缺乏有关历史经验的认识，以致不能解决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代替旧制度所引起的大量复杂而困难的问题。

俄国革命力量的软弱是有许多原因的。当然，它的社会基础是城市产业工人阶级，它的领导是布尔什维克党。问题不是这些作为基础的力量和领导力量缺乏革命的精神或者经验。如果是这种情况，那末，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因

为在俄国，无产阶级相对于整个人口来说是少数，布尔什维克跟绝大多数俄国人居住的农村的联系也很少，而且在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除这种基本的状况外，还要加上内战年代（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中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破坏。这一点对于理解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通常是被忽视或者被低估了，所以，我们似乎需要作大段的摘录：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俄国的无产阶级受到了可怕的损失。在内战的年代里，它确实受到很大的削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还在继续削弱。因此，到了一九二二年，在全国范围内，在职的工人数目还不及战前的一半，也就是说，和一九一三年的一千一百万人相比，只剩下四百六十万。在一九二二年有工作的四百六十万人中，参加工业生产的只有二百万人，加入农业无产阶级行列的不过一百二十万人。

“在职的工人阶级，不仅在数目上有所减少，而且在组织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很多战斗性很强的老工人，在不同的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被党、工会和国家机关吸收去了。还有的特别是在大工业中心，由于失业或者缺少食物，离开了工人的队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出身的男子和妇女，一般是敌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他们为了享受体力劳动者的配给待遇，或者为了隐瞒自己的阶级出身，钻到工人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在一亿三千六百万的人口中，半数 is 适龄劳动者，但新的执政阶级的核心人数很少。即使再加上可以回到以前生产岗位上老工人，那末，一九二二年实际在职的工人数字也仍然是很少的。况且，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主要并不取决于工人阶级的人数多少，它首先取决于它的阶级组织和它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领导的能力。”^①

① 贝特兰：《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第一时期 1917—1923），第 151—152 页。

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中，即使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最有力量和最有经验的地方，也缺乏用新的革命机构去代替旧的沙皇的行政机构和官僚组织的手段；而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最薄弱的农村，布尔什维克对事情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结果是它必须尽可能地同过去遗留下来的垂死的、无效的、腐败的国家机器作斗争。此外，重要的是，不仅要知道这个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有上述的性质，而且它还具有不能消除的阶级性。在本质上，它是经过许多代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具有深刻的资产阶级精神，墨守资产阶级办事的方法，对强迫它服务的革命力量的意识形态和目的怀有深刻的仇恨。贝特兰为了证明后面这种情况和反映国家机器的性质，他引证了一九二二年夏天进行的一次调查，这次调查说明，只有百分之九的旧职员和百分之十三的新职员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

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增加并扩大政府机构的新职能，这些新职能以前是不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这样，政府机构将不仅在它的自身范围内，而且也在整个苏维埃社会内将会成为并继续成为保存和复活资产阶级关系的肥沃土壤。

看来是一种讽刺，领导机构为了控制和反对这些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采取了不少措施，但却引起了相反的结果。特别是为了执行官方制订的政策，指定一些忠诚的革命者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但是，他们多半被新的环境同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官僚。这不是说他们故意背叛了对他们的信任。恰恰相反，确实可以说，在大多数场合，他们竭尽全力地去做所期望于他们的东西，但是，即使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沾染上包围着他们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资产阶级办事的方法。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比其他人能够较长久地抵抗这些压力，当然，如果认为思想和行为最终取决于阶级出身的话，那也是错误的。在这方面，列宁对

这一类问题格外敏感，他远远超过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的大多数战友，贝特兰引用了列宁曾经作过的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但没有真正成功地掌握它，就好象一个征服者表面上征服了另一个民族，但是，在他们继续占领另一个民族的领土的长时期中，事实上他们是被那些被征服者所征服了。因为，那些被征服者‘文化高……，强迫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①

除了对可以信赖的革命者委以重要的国家职位外，在红军中采取了政治委员制度，同时，还建立了处理国家机关中带有敌意的资产阶级性质事件的机构。在斯大林直接领导下，国家监察人民委员会于一九一九年成立，一年以后，这个机构改组为工农检察院，但是，这个机构也没有逃脱其他政府机关的命运，仅仅成为同其他部门敌对的一个官僚机构的分支部门。贝特兰引用了列宁逝世前所写的论文《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的话：工农检察院“现在没有丝毫威信”^②。确实，从这本列宁晚期的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可以看出，列宁对国家机器状况的问题越来越注意了。（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篇论文中把国家机关的情况说成是“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③我们考虑一下，如果列宁仍旧活着并能够掌握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权，为了补救这种情况，他力图做些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当然，这不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可以预料得到，他迟早会尝试发动一个群众运动，去清洗和监督国家机构，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这决不是沉湎于幻想。正

① 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一时期 1917—1923），第 26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3 卷，第 444 页。

③ 莫雪·列文的著作《列宁晚年的斗争》中论述到这一点，这是很有启发性的，贝特兰提到这本书，但没有更多地利用它。

如卡尔所写的：“如果列宁为实际需要所迫，承认了日益增长的权势的集中，但是，丝毫也没有根据可以证明他对‘直接民主’这种抗毒剂的信仰发生过任何动摇。”^①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混乱的形势下，采取这种“直接民主”行动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若干年之后的相对平静时期，它可以认真地被考虑。

经济中保留着资产阶级的关系

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的关系和作风不仅在国家机关中继续占统治地位，在农业中更明显。革命（还有后来的新经济政策）在农业中建立和加强了小农所有制的统治，这种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和一个富裕的农民阶级或富农阶级成长的舞台。更重要的是，在工业、交通业和金融业等转变为国家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中，还保留着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关系。

这里有必要指出，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财产所有制形式，而是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个人和集团之间的真实关系，公有制为这些关系的变革开辟了途径，同时也是这些关系变革的必要的先决条件。但是，就公有制本身来说，既不构成也不保证这样一种关系的转变。在苏联，这种斗争不仅没有进行到底，甚至它还没有开始。贝特兰在他论中国的工业组织的近著中最简洁地说明了这一点：

“经理的绝对权威、专家的特权地位、强调奖金和物质奖励原则在苏联现行管理实践中没有受到限制，这些原则是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建立起来的，

^① E·H·卡尔：《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23），第一卷，第224页。

它们在新经济政策中保存下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接踵而来的迅速工业化时期成了强大的推动力”。^①

当然，这些原则是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的那种等级制的劳动分工所产生出来的。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政府执行这些原则决不是向社会主义前进，实际上，他在解释加强权威和提高专家报酬的决定时，指出了这一措施的消极意义：“不仅如此。这种办法显然不只是在相当部门内，在相当程度上停止一下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并不是一批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向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②

正如贝特兰补充的一样，问题是退了一步之后，却没有再前进一步。他在这方面就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作了简要的讨论之后得出结论说：“列宁的观点符合于俄国革命的特殊阶段的需要，但是一旦（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间）采纳和执行之后，它们从来没有被抛弃过。恰恰相反，许多年来，工厂经理和党的书记的势力和权威（不接受工人批评的权威）变得更大了。实际上，以工厂中管理人员、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为一方，和直接生产者为另一方之间所存在的权威和指挥关系的巩固，已经为苏联修正主义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这些关系的巩固不仅为苏联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且，这些关系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苏联修正主义的实质。

① 夏尔·贝特兰：《中国的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在管理和劳动分工中的变化》，每月评论出版社，1974年版，第73页。

② 《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502页。

③ 夏尔·贝特兰：《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第76页。

不容怀疑，许多革命初期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了解正在产生的一些情况，但是，他们缺乏采取有效的斗争措施的力量和手段。后来，当条件更有利于进行一次斗争去改变这些过去遗留下来的、并在内战和重建的困难年代不得不保留甚至加强的资产阶级关系的时候，党的领导却丧失了发动这场斗争的认识力和意志。在这个过程中，修正主义不仅在苏联天天在实践，而且已成为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了。这可能是贝特兰即将问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中心论点之一。

一些理论和方法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

据我看来，贝特兰运用的阶级理论，就它的应用来说是不可能加以反对的。下面的这段列宁语录很好地概括了这个理论：

“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①

但是，我认为，对列宁和贝特兰的理论作某些补充，对于澄清象一九一七年以后的俄国和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这类过渡性质的社会提出的某些重要的争论是有用处的。我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即阶级成员的适当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庭。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出生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并且这个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的或者她的生活方式，但是，这不是说个人一定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

永远属于他们出生的那个阶级。他们通过每一个社会结构所特有的历史的道路使他们的阶级地位上升或者下降。而这种变动中的个人同他们的家庭是一起的，或者他们在一个新的阶级地位上组成新的家庭。而家庭阶级地位的变动，通常至少需要有两代人的时间。

在“正常”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是受保存这种制度和保护受益者利益的国家机关所制订的财产法的支持和稳定的。就是说，财产所有者构成统治阶级，或者按不同种类的财产，构成几个统治阶级。革命的明确性质是推翻国家，改变所有制。根据上面所讲到的，我们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决定社会的阶级成分的真实生产关系也在进行类似的改变。但是，只要把权力交给那些同以前的统治阶级的利益相反的阶级代表的手中，并除掉这些生产关系的保护者和稳定这些生产关系的因素，革命就有了变革真实的生产关系的可能性，同时还把前一段时间中没有先例的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引进阶级体系之中。这样，许多有产者不仅破产了，而且失去了权威的地位，他们还经常被流放或者从肉体上被消灭掉。相反，许多工人被推上等级制的劳动分工中的权威地位。这些运动甚至在大规模的范围中进行，这就产生了真正消灭旧的阶级并开始完全消灭阶级的表面现象。但是，只要透过表面去观察真实的生产关系，就会发现这种现象是虚幻的：一些基本的变化只能是慢慢地发生，只能是经过长期的和复杂的斗争以后才能产生。甚至在当时，这种变化还可能完全没有发生。

贝特兰在这方面同意中国人的观点，把这种斗争叫做阶级斗争。我认为，这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同时我认为，要理解这是具有若干特点的阶级斗争，它跟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那类阶级斗争有所不同，这是重要的。

当然，我们熟悉的那种阶级斗争在革命后确实还在继续着。被推翻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通过组织反革命，并经常依靠没有发生革命的其他国家中与之相当的阶级的帮助来实现复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统治阶级逐渐死去，这种阶级斗争形式的重要性降低到没有现实意义的地步。贝特兰在叙述苏联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时，他所注意的确实不是这种形式的斗争，他认为，苏联和中国都没有受到某种仍然存在的旧统治阶级残余的严重威胁。他所注意的是更复杂的现象，即在革命后的国家机关和经济领域（包括职业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机构）中享有特权和权力地位的人，这些人为了保持他们的地位，努力地在寻找新的方法去稳定、保护和永远保持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

在这里，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作为阶级成员的基本单位具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生来就取得一定地位的平等机会，那么，就我们所知，阶级就完全不存在了。可是，只要收入、地位不同，权威就仍然存在，那么，完全平等的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决定性的一点。出身在享有相对特权地位家庭的孩子事先就决定了他们处于有利地位，这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封建主义社会都同样是真实的。所以，革命后的社会阶级斗争多半是集中在真实的不平等问题上（这种不平等按照社会劳动分工中所占有的不同地位去划分家庭），这决不是偶然的。这些不平等不仅仅是，或者也许首先不是关于收入的问题：相当大的范围内的收入差别和实际上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的生活机会是可以相容的。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他若干因素。这些因素不太明显，不易发觉，更不能测量：例如出生于更“文明”的家庭环境的优越地位，享有不同的受教育机会，同权贵们的各种“联系”，从父母那里吸收的力量感和自信感等等。以上列举的这些因素还可以增加，并作进一步分析。这些无形的

因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都是起作用的，它们和收入以及财产所有的巨大差别相互作用。在后者已消灭或者大大减少的地方，这些无形的因素就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们成为特权和仍然存在的资产阶级阶级关系体系的主要保护墙。生活在大墙后面的这些人(当然有例外)企图扩大它们，正式批准它们，最终授予它们以至高无上的合法性标志，甚至把它们变成是新的所有制关系的合法制度。

那些占有特权地位并寻求用制度形式以加强和永远保存它们的人，成了革命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当然，阶级斗争的另一个主角是广大工人和农民，他们的切身利益不是保卫他们的阶级地位，而是要消除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男女之间以及其他差别)，这些差别构成了阶级体系的客观基础，并且(作为这个过程的必然部分)工农群众还要清除为保存和维护这些差别的继续存在而服务的社会的和思想的障碍物，这两者之间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必然是长期的、复杂的。在这里，我将只注意主要的斗争领域之一即执政党本身。我们知道许多关于中国的斗争，因为它大部分公开了，在中苏争论和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争论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了。苏联的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可以认为，我们所知道的许多关于苏联党内斗争的情况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部分的原因是由于在斯大林时期对所有反对派的残酷镇压，以及当时与后来对苏联历史的系统篡改，包括对苏共党史的篡改。我们对苏联革命后的阶级斗争无知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第二和第三国际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深受粗鄙的“经济主义”影响，其后果是，对分析和理解首先由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取得的历史上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完全不适当的理论结构。贝特兰大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践和理论的成就，已经开始改变

这种无知的状况，我们迫切地期待着从行将问世的几卷书中得到更多的启发。

苏联社会的性质——最后的话

贝特兰在他的新著第一卷中，对今天在苏联存在的社会性质没有谈得很多，并且他说话很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联是一个阶级社会，存在着两个主要阶级，就是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前者在列宁时代已经存在，但是，还没有巩固它对政权的掌握。从那以后，它不仅加强对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控制，而且在思想上和数量上也渗透到共产党内，从而结束了它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情愿的和不可信赖的工具的暧昧地位。相反地，无产阶级失去垄断国家政权的阶级地位，同那些处于经济发展相类似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地位一样。苏联的无产阶级仍然是被迫出卖劳动力以获取生活资料的被剥削阶级，他们没有监督劳动过程和产品分配过程的任何可能性，当然，苏联的国家资产阶级同美国的资产阶级一样，也是一个剥削阶级。

在这些情况下，贝特兰认为把苏联划入资本主义社会是必要的，但是，他却小心翼翼地加了一个“特别类型的”限定语。然而，书中前两页的论述，好象相当大地削弱了这个限定语的力量，“苏联被认为是产生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国家，但是实际上在那里已经产生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更有甚者，在‘计划经济’的幌子下出笼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即利润规律，而生产资料的使用完全受这些规律所支配。”假如是这样的话，计划经济实际上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幌子，那末，苏联制度的特殊性好象只在于资产阶级是直接或者是通过它的国家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当然，后一种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形式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流行的）。这好象也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国家资产阶级的努力对制度不会有多大的影响。

这些论点和推论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贝特兰在这本书中没有提出足以使我信服的证据和论断。同样,我在别处也没有看到使我信服的证据和论断。总之,就我来说,这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我非常希望《苏联国内阶级斗争》的最后两卷出版后,不再是这种情况。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第八期美国《每月评论》
杂志 朱新民译)

再论苏联社会

〔美〕罗斯·甘迪

编者按：这篇文章提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并且联系到苏联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历史上这一类剥削阶级相似的情况。这个问题值得人们研究。

托洛茨基分子说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是一个等级或者一个社会阶层。苏联人把它叫做知识界。他们都要我们相信这个官僚集团不是一个阶级。他们说，它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它不是依法占有土地和工厂。每个人不是都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统治阶级解释为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集团吗？既然苏联的官僚集团不是依法占有生产资料，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一个统治阶级。

斯威齐正确地说明，这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误解，因为苏联官僚集团之所以成为一个阶级是就真实的生产关系而言的，并不管法律形式如何。如果它实际上占有了土地和工厂，那末，它就是一个统治阶级。

我认为，总有一天这个阶级会成功地使它实际上占有的生产资料得到法律的批准，从而使新的社会关系合法化。马克思曾经说过，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产生之后，在它变得稳定并用法律加以明确地规定之前，会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只要现状的

基础即作为现状的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的和有秩序的形式……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①

从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五三年，苏联经历了它的不稳定时期：革命、内战、帝国主义的包围、工业化、世界大战、战后重新建设。这个疾风暴雨的过渡时期已经让位给平静安宁的时代，并且，现存秩序和它的基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正采取一种有规则的、有秩序的形式。我们把具有这种社会关系的制度叫什么名称，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不管叫它什么，不管它最后创造出何种法律形式，总之，苏联已经不再是一个过渡的社会。

斯威齐在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辩论时说，我们必须把苏联的官僚集团看成是一个阶级。在这种争论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很可能是站在斯威齐一边的，因为他们从不否认一个官僚集团能够变成统治阶级。并且，我认为他们将会用“阶级”一词来称呼今天的苏联官僚集团。让我们看看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对“官僚政治”这个概念的使用吧。

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了激进的社会学基础。当时政府机构还很小。不象现代政府是由大量的卫生、教育、福利和战争等官僚政治所支持——这些政府部门在当时还没有出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方面都没有遇到这样巨大的官僚政治。

但是在一八四〇年，德国的国家官僚政治已经统治了国民生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德国，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统治都太软弱无力了，“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分工而取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4页。

得了对公共利益的管理权的特殊领域，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在现代官僚政治中更为加强的独立性。”^①恩格斯说：“结果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他们掌握着大权，他们和其他一切阶级处于对立的地位。”^②在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又重复马克思的论题，贵族和资产阶级对于统治是太软弱无力了。并且他得到这样的结论：“德国现行的国家制度不过是贵族和小资产者之间的妥协，妥协的结果，管理国家的权力落到了第三个阶级——官僚的手里。”^③

这种把官僚作为一个阶级的观点完全能够运用到苏联的历史发展中去。由于十月革命、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等，使俄国的各个社会阶级困顿不堪。一九二一年，贵族已经逃往国外，资产阶级被粉碎了，农民还没有组织起来，无产阶级还没有巩固它的社会地位。斯威齐在他的评论中认为苏联的无产阶级是太分散了，而当时列宁也承认这个事实。所有的阶级都太软弱，无力统治这个国家。官僚分子（旧的沙俄官吏、复员的红军军人、布尔什维克党员）成了俄国的统治者。官僚政治越来越厉害，从而加强了它对苏联社会的控制，甚至还给官僚分子以许多新的特权。这样，它就成为统治阶级了。

官僚集团掌握了生产资料，指挥投资的方向，决定积累和消费的水平，并在社会各阶级中分配社会产品，而这个集团自身就从中占有最大的份额。所以，实际上，官僚集团占有了生产资料。生产资料是这个统治阶级的集体财产。

由于工厂、机器和原料为这个阶级集体占有，个人不能出售或出租生产资料。然而，斯威齐在他的文章中暗示说，官僚集

①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

② 恩格斯：《德国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50页。

③ 恩格斯：《德国的制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页。

团可以通过一种继承制度把这种占有转让给他们的孩子：官僚分子的孩子总是比工人或农民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所以，官僚分子的孩子长大以后，有资格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不管法律上怎么说，这个阶级总是通过党和国家占有、控制和支配生产资料。

我认为斯威齐的分析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马克思写道：“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刺斯坎的僧侣，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① 如果伊特刺斯坎的僧侣是一个统治阶级，那末，苏联的官僚集团也是如此。

神权政体遍及整个历史。马克思在评论古代埃及的法老时说：“计算尼罗河水的涨落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等级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② 祭司们集体地掌握生产，并且就这样变成了统治阶级。

每个人都知道，在中世纪，占有土地的贵族是统治阶级。但是，人们经常忘记教会是最大的土地占有者。“远在查理大帝以前，教会早就占有法兰西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一。可以肯定，在中世纪，几乎整个天主教西欧都保持着这样的比例。”^③ 在某些地区，教会占有一半土地。这个统治阶级——教会统治集团——在历史上是最有力量的阶级之一。马克思写道：“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3页。

② 同上书，第562页。

③ 恩格斯：《马尔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62页。

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①马克思意识到一个统治阶级能够集体占有生产资料：教会统治集团就是这样进行统治的。他还注意到教会的统治阶级从工人阶级中吸收许多成员（正象今天苏联的官僚所作的那样）。

如果马克思还活着的话，他将会这样说，在苏联，那种使社会分为阶层的官僚主义的计划经济社会是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曾用各种方法给这些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下定义：官僚集体主义（萧特曼）、极权国家（希法亭）、国家社会主义（内维尔），不管给这些社会的名称是什么，有一个特点是清楚的——即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提出这个观点的共产主义者，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指出的方向的。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三月第十期美国《每月评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组译）

^① 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79页。

古巴：一个神话的破灭

从反帝的革命战士到社会帝国主义的走卒

〔美〕《革命》周刊编辑部

由于古巴在当今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使得揭露古巴领导人的阶级本性和古巴社会的实质显得愈益重要。

说起来古巴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非洲，在苏联指挥下打仗的成千上万的古巴兵据称是在那里推进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事业。可是，美国出钱让雇佣军在那里打仗也打着自由和“反帝”的旗帜。显然，必须透过事物的表面，才能认清世界上究竟发生着什么事情。要了解一个国家，我们就应该问一问，是哪个阶级在那里掌权。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政治，我们就应该问一问，这个国家的政治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一九五九年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对古巴来说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美帝国主义和古巴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统治被推翻了，所有他们的食客、狗腿子和打手都被清除了。正因为如此，也因为卡斯特罗和他的追随者所宣布的革命目标，世界上很多人曾把古巴看成是对自己革命斗争的鼓舞和向导。

但是，古巴领导人的阶级观点、他们所提出的政治路线和政治手段，却使世界上照此办事的其他地方的革命都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就证明它们对革命斗争的发展是错误的，有害的。

在古巴，革命同样也走向了它的反面。今天的古巴，就象它当初作为美国的殖民地那样，成为苏联的殖民地了。古巴的经济受蔗糖支配，古巴劳动人民正在血汗工资制下以自己的劳动来偿付无穷无尽的苏联贷款。一九五九年反帝革命的领导人，现在成了新的买办资产阶级。

当前古巴的问题显得特别尖锐是出于两个原因。

国际上，苏联这个帝国主义国家，力图在古巴代替美国的原有统治地位，正在越来越重用古巴。苏联把古巴既当胡萝卜、也当大棒使用。在安哥拉，苏联打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幌子，驱使古巴军队为其征服这个国家打头阵。同时，苏联又以古巴为范例——苏联的“援助”如何为古巴买到了社会主义，向安哥拉和其他国家提出同样的交易条件。这种“反帝”卢布和“反帝”坦克的结合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力图取代世界主要帝国主义大国——美国地位的法宝，为此，古巴就成了苏联人的无价之宝。

党代会上谦恭陈词

在国内，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召开了古巴修正主义“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同苏修集团勾结得更加紧密。在“革命”词藻下隐藏了多年的资本主义关系，现在终于抛头露面了。

这次党代会批准了古巴的新“经济计划和管理制度”，把“利润准则”奉为国家的最高原则。大会的又一特色是卡斯特罗在会上做了一个冗长的自我批评。他说自己没有及早按照苏联的思想方法行事。他在这个“自我批评”中竭力粉饰古巴的现状，并对新沙皇卑躬屈膝到极点。大会显著地表明了古巴目前的新殖民地地位。

卡斯特罗检讨说：“如果我们谦虚一点，如果我们不那么妄

自尊大，我们就会明白，革命理论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我们实际上缺乏学识渊博而对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真正重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科学家……”。

谦恭之词诚然出于古巴领导人之口，可是几年前，他们还在自我标榜，说自己是第三世界和其他国家的革命灯塔，不同于他们所认为的修正主义者的“保守主义”，也不同于他们诽谤为“教条主义”的真正马列主义。

在六十年代，古巴领导实际上已越来越谦恭地充当政治上听候苏联差遣的小厮。例如，一九六六年攻击中国，一九六八年支持苏联入侵捷克等等。但是，当苏联新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在日益众多的革命人民心目中越来越臭的时期，古巴唯恐难保自己的威望和“最革命”的形象，那时确曾试图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今天苏联把套在古巴政权上的绳索勒得很紧，所以，古巴的领导人就只得比以往更加“谦恭”。现在，卡斯特罗说，“古巴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以和世界进步的堡垒苏联的忠诚友谊为基础的。”

这些年来，苏联对古巴的“忠诚友谊”的利用业已改变。早期，苏联对美关系处于劣势时，它往往趋向于投降与合谋。现在，当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竞争变得日益尖锐和激烈时，它利用所谓“缓和”，主要是作为他们侵略和准备战争的烟幕，而美帝国主义利用“缓和”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时代不同了。不过，苏联统治者要做的任何事情对古巴来说似乎都是好事。

卡斯特罗为了准确无误地表明自己的心迹，特意回顾了一九六二年的导弹危机。当时，苏联鲁莽地在古巴设置导弹，之后，当受到美帝国主义的挑战时，它不仅以撤出导弹而彻底投

降，并且还答应美国可不征得古巴政府同意就视察古巴，以证实导弹确已撤走。对此，当时卡斯特罗曾正确地公开谴责过苏联。现在卡斯特罗说自己错了，因为他“不理解”，苏联怯懦地把古巴当作和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客观上”却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大胜利”。

但卡斯特罗在党代会上还不只是被迫承认错误。古巴领导人不仅必须奴颜婢膝地对待苏联的外交政策，他们还必须“正确地应用”苏联在经济管理方面“行之有效的主要经验”。

资本主义规律支配古巴经济

卡斯特罗所谓的经验是什么呢？那就是“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支配社会主义建设”，而“货币、价格、财政、预算、税收、贷款、利息以及其他商品范畴必须起到应起的手段作用……以决定哪些方向的投资最为有利，哪些企业、单位、工人集体经营得最好，哪些经营得最差，以便能够采取相应的措施”。（党代会上的讲话）

卡斯特罗宣称这是“现实”的指示。但是，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的现实。工人阶级之所以必须运用这些规律和范畴，是为了有意识地约束和限制它们所起作用的范围，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劳永逸地废除它们的条件。然而，社会主义是绝不受资本主义规律支配的，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任何区别了！卡斯特罗在这里所说的话，包括什么盈余等等，统统是从总结了苏联资本主义复辟经验的苏联最新经济学教科书里搬来的。

从卡斯特的进一步说明中可以看出，“新经济体制”是以支配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律为基础的，而且还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价格根据生产成本制定；能以最快速度收回投资的工厂和企业就应该是获得大力发展的部门；这些单位的经理

应根据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所管企业的利润率领取报酬；工人的工资根据他们所在企业的利润率来定；如果少用工人而能降低生产成本，就应该将他们解雇；此外，工人的工资还应严格地根据按件计算的生产率（据卡斯特罗说，目前有百分之二十古巴工人的工资是照此规定发给的）或能否完成自己的生产定额来发给，换句话说，就是根据他们生产效率的高低（已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古巴工人的工资按此标准发给）来支付工资。

这确实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再没有比下面这件事更为丑恶的了：卡斯特罗说，他为古巴如此严重的房荒现象感到遗憾，但“革命还不能”对此“做出多少改善”——可是后来却发现政府正在兴建十四幢旅游旅馆和扩建其他旅馆。显然，政府所考虑的并不是人民需要什么，而是什么能获利最多。

五十亿美元的抵押贷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多年来古巴领导人硬说，苏联的援助和购买蔗糖，使古巴能买进“在古巴同时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一切。而现在，这个岛国以五十亿美元抵押给苏联了，并且在经济上比以往更加依赖苏联。事情已相当清楚，实际情况恰恰是反过来：是苏联能够为自己买进一个新殖民地。这一形势也比以往更清楚地说明，古巴领导人的战略和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毫无共同之处，说明古巴事实上从来就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古巴原来的革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为什么它会走向反面而远远背离社会主义？为什么今天的古巴甚至没有获得自己的独立和民族解放？

小资产阶级掌权

帝国主义势力为了把古巴占为己有，篡夺古巴人民为争取

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成果，已不是第一次了。苏联统治者现在玩弄的阴谋诡计在世界上也不是什么新东西。它虽然披上了红色的外衣，但本质上和美帝国主义多年来的所作所为毫无两样。

一八九八年，当古巴人民经过多年反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斗争而临近赢得独立时，美国以协助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为名而闯了进来，就此控制了 this 岛国，使之成为美国的新殖民地。由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刚在美国形成，这就成了美国为开辟输出资本和获取原料资源新地区而发动的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

大量美国投资源源流入古巴，加强了由西班牙殖民主义在古巴建立了几百年的古巴社会的殖民地和半封建主义性质。美帝国主义者支持古巴地主的统治，培植了一小撮依靠美国资本的资本家，这样就把古巴从西班牙殖民地变为美国的新殖民地，把古巴进步的一切可能性都扼杀了。在一九五九年革命时，古巴的土地所有制和西班牙帝国时期相比几乎丝毫没有改变，而且国家的单一作物经济早已停滞不前。

这种土地所有制给予城乡工人阶级以及无地的小农以无比沉重的负担。同时，也阻碍了除最富有的地主以外的一切力量薄弱的小的民族资产阶级（限于生产很少几种不是由美国分公司制造或从美国进口的东西）和相当大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发展。

多少年来，古巴工人在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斗争中，都起着领导作用；他们也为自己的眼前利益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这在三十年代达到了高潮。在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下，工人阶级和它的同盟军掀起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罢工和示威浪潮，包括各糖厂的武装起义和建立苏维埃（革命工人的代表会议）。

当时的美国傀儡政府被推翻了，但不久就由巴蒂斯塔为首

的军人政权所代替。虽然在以后几年里斗争仍很激烈，但工人阶级没有能够保持住它的前进势头，终于挫败下来。由于过去一些错误占居了主导地位，共产党愈来愈变为修正主义党了。四十年代，共产党领导人同意参加巴蒂斯塔政府。于是，当巴蒂斯塔鄙弃了他们以后，他们渐渐成了装饰品。直到一九五九年革命前夕，他们仍留在政府里。这种情况大大地削弱了作为一支有组织、有觉悟的工人运动的力量，虽然工人从未停止过为改善自己的现状而战斗。

激动的小资产阶级

五十年代，小资产阶级成了古巴最容易激动的阶级，而且在为自己利益作斗争时组织得最好。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就是从占古巴人口百分之二十五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中发动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商人没有生意做，推销员无货可推销，教师没有学生教，律师几乎无人问津，医生几乎没有病人上门，建筑师和工程师业务清淡。在一九五六年“七·二六运动”的“纲领—声明”中，他们宣称是受“民主政治、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等理想，……杰斐逊式的民主政治指导的”，并且宣布：“民主政治不能是一个民族、一个阶级或一种宗教的政府，而必须是一个全体人民的政府。”

这当然表达了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仇恨压迫它的大资产阶级，厌恶工人阶级革命并抱有超阶级“民主政治”的梦想。它的实践纲领是要废除美国控制甘蔗生产定额制度，以限制美国和地主，限制大地主对中型种植者的控制，把闲置和强占的田地分配给小农，把一部分利润分给城市工人以扩大国内工业品和新投资市场。

纲领既定，卡斯特罗和一小群人就从马埃斯特腊山区展开了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武装斗争。而这时，其他的青年知识分子和

自由职业者都在城市里组织反抗运动。除一小撮与地主和美国直接有关的人以外，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支持这场内战。许多工人支持并参加了这场战争。在战斗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是农村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农，因为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保住他们的土地免遭地主和军队的掠夺。主要由农民组成的巴蒂斯塔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

巴蒂斯塔政府同几百名武装起义者之间仅仅经过两年的交锋就垮台了。在最后几个月里，连美国政府在空投支援物资给巴蒂斯塔政权时也认为，如能和“七·二六运动”达成协议，肯定要比让巴蒂斯塔政权存在下去更为合适。

卡斯特罗在一九五九年取得政权以后，立即赴美国进行“友好访问”。他在纽约宣布：“我已经明确而肯定地声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对于促进古巴发展的私人投资的大门是敞开着。”他甚至呼吁美国制定一个对拉丁美洲进行大规模援助的计划，“以避免共产主义的危险”。但是，这些话并没有使美国统治阶级感到放心。

虽然卡斯特罗宣称愿意和美国政府友好，而美帝国主义者也希望卡斯特罗支持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不没收甘蔗种植园和糖厂，不结束美国在那里的垄断事业，古巴是不会有 any 变革的。正是这些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引起了起义。对它们挑战就意味着向整个殖民制度及其主人挑战，但在它们面前退却则又不可能不失去一切。

当卡斯特罗宣布限制最大种植园（其中很多是美国糖业公司拥有的）规模的第一个土改法时，一下子乱成一团。美国开始对起义军（实际上已是古巴政权）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图推翻它，古巴则开始没收那些妨碍它独立的帝国主义势力的财产。一九六一年，政府已掌握了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这时，美国对古

巴实行了经济封锁。四月份,美国发动徒劳无益的猪湾入侵。

卡斯特罗:秘密的“马列主义者”

一九六一年初,苏联派遣了第一个贸易代表团到古巴,赫鲁晓夫建议用苏联导弹保护古巴。五月一日,卡斯特罗宣布说,从此以后,古巴将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年晚些时候,他宣称自己原本一直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解释道,“当然,当我们只有很少人站在图基诺顶峰(在马埃斯特腊山区)时,如果讲我们是马列主义者,那么我们可能永远也下不了山,到不了平原上。”

美帝国主义者利用这一情况,说古巴革命领导人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是在伪装下取得政权的。其实,美帝国主义者是在找遁词,掩饰他们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当古巴革命一触动到他们财产时就反对它这一事实。

绝大多数古巴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坚决支持者。他们非常赞成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例如,没收种植园和糖厂,保证小农的土地所有权(在多数情况下,增加了他们的土地);减低租金、电费等,让成千上万失业工人就业;从事建筑医院、道路、学校等工作,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以及其他种种减轻群众负担和使他们改变落后面貌的措施。

但社会主义不只是一种想法,不是口头上谈谈的事情,也不仅仅是接管一个政府。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革命,一种阶级关系的革命,因而,工人阶级不仅仅在理论上是一切的主人,而且实际上应该通过自己的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通过自己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专政,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在这个基础上,工人阶级才能够领导对资产阶级的持久而有效的斗争,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才能够改变物质条件和工人阶级本身,以至逐渐达到完全消灭阶级。

可是,这不是卡斯特罗和他的同伙所要走的道路,尽管他们

口口声声说要走向社会主义。他们起来反对旧古巴的新殖民地和半封建状况，但是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使他们渴望迅速改变自己过去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野心勃勃地要保持并加强他们凌驾于工农群众之上的优越地位。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使他们做到这点。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观，使他们厌恶和害怕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真正改革古巴的长时期的艰苦斗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确也憎恨丑恶的资本主义，特别因为它压迫他们，但他们并不要求改变那种使他们能置身于群众之上，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事业而又无须成为工资奴隶的社会劳动分工。

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他们的阶级地位和世界观从一条理想主义的政治路线中显示出来。这条路线反映出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渴望看到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也反映出他们对于能够领导改造世界的唯一社会力量——工人阶级的鄙视和恐惧。

这个所谓“古巴路线”，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轻举妄动，它要求在没有任何阶级斗争，尤其在没有任何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立即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古巴领导人把共产主义说得似乎近在眼前，似乎只需要剥夺了私人财产，阶级也就消灭了。

事实上，这个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古巴领导人的理想主义世界观的早期形式的实质，就是依靠心中想着群众利益的“开明”统治者来建设社会主义。古巴领导人把自己看成是自古以来群众的、最开明的“救世主”，他们相信能够把自己的愿望灌输给社会。实际上，这条路线对古巴本国以及全世界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中具有革命思想的许多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些人希望看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但对于工人阶级，却和古巴领导人没有共同的观点。

由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所引起的极“左”的政治路线，同样也表现在古巴领导人的国际事务活动中。他们建立了一套所谓“游击中心论”。根据这个理论，一小股武装人员开始在乡村从事游击战，举行暴动，多少有点自发地推翻旧政权，让“游击英雄”掌权。

这是违反以群众的自觉和有组织的斗争为基础的一切成功的共产党的革命经验的。例如在中国，这就是人民战争：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动员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持久战争。当格瓦拉试图把这种“游击中心论”用之于玻利维亚时，自己却被杀害了，而整个行动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决定性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在这条小资产阶级政治路线下的修正主义，已愈来愈趋向表面化。古巴领导人不是动员和依靠工人阶级来改变存在于古巴的实际阶级关系，铲除帝国主义掠夺者在古巴建立的畸形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而是想寻找可以代替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途径。尽管他们口头上说要培养“新人”，但却是越来越按照一切修正主义者共同的路线行事。这就是决定性因素不是人而是物，就是为了使他们那变种的“社会主义”在古巴取得胜利，必需从国外获得生产能力。他们的世界观使他们永远也看不到生产关系的革命是发展生产力的关键。他们更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古巴领导人组织群众进行自觉的斗争，而企图把国民经济抵押给苏联以购买社会主义。

列宁说：“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160页。

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①

这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并继续革命直到共产主义的路线。在古巴,当然就应该发动工人打破从半殖民地的旧社会承袭下来的劳动分工。尤其重要的是,改变这个岛国的经济结构,因为这种经济结构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市场生产蔗糖。可是,由于古巴领导人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地位和世界观,他们反对这条路线。

卡斯特罗说,革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生产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丰富物质”。对他来说,这就是以蔗糖换取那些他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的努力永远也生产不出的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古巴领导人的计划就是利用略作形式上改变的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劳动分工以及种植园,以最高速度生产蔗糖,去换取财富。现在,买主和“供应者”已不再是美国,而是苏联了。

古巴一旦采取了这条路线,就越来越滥用群众的热情,工人阶级的作用已不是使社会革命化,而是被降低到拚命干活以生产出必需的资金。于是,基本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保存下来,并且强化了,工人阶级沦落到为利润而生产的附庸地位。这绝不是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更谈不上共产主义,实质上,这只是一个换了主人的和过去一模一样的旧社会。工人的作用就是拚命干活。古巴领导人越来越成为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国家官僚资产阶级分子。

甚至古巴人民支持反帝斗争的革命热情和愿望,以他们对越南人民的支援为例,都被滥用来支持苏联在国外对抗他们的

^① 《伟大的创举》,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美国敌手的冒险事业，例如在孟加拉以及目前在安哥拉。

古巴一旦走上了购买“社会主义”的基本的政治道路，而不走依靠那些能以自力改造社会的工人阶级和群众的阶级斗争的道路，它就必然会出现修正主义的基本的经济政策。卡斯特罗所孜孜以求的金钱，只有通过保持和加强原先引起古巴革命的那种极端畸形和半殖民地化经济才能获得。生产蔗糖出售给苏联已成为古巴经济政策的基础，所有快速致富计划以及“社会主义”宣言和诡计都是以此为基础并为此服务的。这种经济依赖性，反过来又成为古巴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深入发展的依据。

通往新殖民地的糖衣道路

蔗糖是古巴的灾祸。美国曾经通过控制食糖市场控制古巴。美国人和古巴的糖大王们曾阻止人民在闲置的土地上种植粮食，使人民贫困和一无所有，除为蔗糖干活而外，别无选择。糖大王把整个岛国拴在生产蔗糖以供出口的事业上，使这个富饶的热带国家最终不得不进口绝大部分粮食。这种安排对地主和帝国主义分子最为有利。由于食物价格非常昂贵，所以大多数古巴工人和农民只能吃大米、豆子和根菜植物。

在革命的最初几年，土地，更主要是那些在土地上劳动的人，开始摆脱了那种单一经营，农作物开始多样化了。过去种甘蔗的土地上仍种甘蔗，但在其它土地上则种别的作物。那几年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因为一向闲散的劳动人民和闲散的物质资源都调动起来了。某些工业开始得到发展，并且开始兴建学校、医院以及其他事业。

六十年代初，美国关闭了原来的古巴食糖市场，苏联和中国购买古巴糖，帮助古巴克服困难。一九六三年初，当古巴经济发

展遇到挫折，各方面出现匮乏时，卡斯特罗前往苏联与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会谈。回国时，他已有了一个新的计划：不再搞多样化的农业，将生产更多的蔗糖。

那时古巴已向别国借了大量债款。苏联提出大大增加它对古巴的贷款，以高于当时国际市场的价格每年购买五百万吨古巴糖——比这个国家当时的年产量还多，从而使古巴能够购买苏联的货物。“援助”是饵，蔗糖是钩，而古巴领导人却把它一口吞了下去。

在苏联“援助”的背后

对苏联统治者来说，“援助”是一桩好买卖。苏联新资产阶级分子在推翻了苏联工人阶级的统治以后，日益受到帝国主义规律的支配：需要垄断原料资源和输出资本，以达到榨取超额利润的目的，并且需要与帝国主义敌手争夺对世界的统治。他们看到，只要把古巴纳入苏联帝国主义轨道，就可以年复一年地从古巴榨取巨额财富，并把它作为同美国进行争夺的政治工具。

象任何一个狡猾的毒品贩一样，苏联拿出第一批样品时，索价低廉。头一、两年的“援助”是无息贷款，以后，他们就开始收百分之二点五的利息了。他们的实际利率比这还要高得多。在原协定书中规定，百分之八十的苏联贷款和现金必须用于购买价格已大大上涨了的苏联货。就象在利率问题上一样，当古巴的依赖一经造成，苏联马上增加赌注：要求它把苏联贷款全部用来购买苏联货。根据一位掌握古巴统计数字的作者所述，苏联卖给古巴与西方相类似的机器，其价格比西方高出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五十三。而且其掠夺行为更加蛮横无耻：虽然苏联起初付给古巴的糖价高于当时国际市场价格，但他们一转手就把大部分糖以更高的价格卖给东欧国家。

这就是苏联在全世界的典型做法。“苏联正是通过不平等贸

易来实现资本输出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实质上，究竟苏联是以获取利息的形式赚回利润，还是从销售获取超额利润，在贸易协定将这种销售和资本输出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只不过是一个记帐方式而已。”^①

但是，苏联的野心绝不限于统治古巴。象所有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样，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企图统治全世界。对苏联来说，古巴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它可以在古巴“革命”幌子的掩护下，把势力渗透到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国。由于苏联在拉丁美洲取得立足点的意义十分重要，由于它希望在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进一步在政治上（最后在军事上）利用古巴，它愿意给予古巴比在它控制下的其他国家更为优惠的“交易条件”。

自足并不“合算”

古巴领导人把他们的国家抵押给苏联的理由是：古巴拥有广阔的甘蔗田和大量糖厂，并且还有未开垦的土地；但是工厂极少，铁矿品位低劣，炼钢设备也很少。生产蔗糖在国际市场上出售，非常有利可图；而搞农业多样化和建设工业，却又慢又费钱。

卡斯特罗在一次演讲中说，“要做到大米自足……我们就要多用三十三万英亩灌溉田，而且要把我们供不应求的水用于农田……毫无疑问，少生产一百五十万吨糖对古巴来说是不合算的，用三十三万英亩种甘蔗就能够生产出一百五十万吨糖，就能够使我们在国外的购买力提高一亿五千多万美元，而花同样的力量在这些土地上种出的大米的价值，只有二千五百万美元。”

把种大米的土地去种甘蔗，再用出卖蔗糖的钱来买大米，还可以赚很大一部分钱，那末，为什么不去种甘蔗呢？这就是古巴

^① 引自美国《红色文件》第7期《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一文。

政府不顾一切地采取的方针。一九六四年，古巴决定把蔗糖生产从当时年产三百九十万吨提高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万吨。

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观点来看，这一切具有充分的经济意义——非常“合算”。

客观上，这个决定就是要把古巴完全搞成美帝当初搞的那个样子：根据最有利可图的原则行事，经济畸形和永远依赖。尤其可悲的是，古巴并没有达到年产一千万吨的糖产量。不过，即使超过了这个目标，它的经济结构的根本效能，即依赖帝国主义的状况依然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古巴肯定是种甘蔗比发展工业有利可图，否则，美帝早就把古巴工业化了。甚至在最近几年，国际市场上糖价很高，使古巴第一次在对外贸易中获得少许赢利时，“经济学”仍指示它把赢利用于扩大蔗糖工业，以便获取更大的利润。

利润挂帅

从最近这次党代会上卡斯特罗的发言中听来，似乎古巴多年来一直不懂什么是“利润准则”。实际上，扩大蔗糖生产的决定说明，政府建设“社会主义”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是立足于利润的。这不是什么误解，而是一个阶级的决策，是决定古巴走什么道路和哪个阶级将受益的根本政治措施。

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也必须考虑“利润率”，但利润仍属反映资本主义旧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简单地说，工人阶级通过国家，必须考虑以货币形式表现的生产成本（工资、原料价格等）和产品的售价，而售价一般应能抵偿成本并有盈余。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目的是不是营利。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路线——通过它的政党和国家的有意识的决议——决定经济政策，制订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计划。从根本上说，计划的基础是考虑用社会的

物质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衣食，学校，新的工厂等等。工人阶级承认利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能够进行一场限制和最后完全消灭利润的政治斗争。而把“利润准则”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无论意图多么好，让工人阶级靠外援和外贸来建设社会主义总是办不到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目标，即共产主义和没有阶级的社会，不仅仅是物质丰富。可是，卡斯特罗恰恰就是这样向群众解释的。他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个理想乐园。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解放，必须领导人民群众改变自己国家的现状，消除造成阶级矛盾的物质和社会基础，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群众，这样，每个人都将成为工人，而全体工人就是社会生产和社会各方面的有觉悟的主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阶级才能消灭，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莫斯科—哈瓦那，亦步亦趋

在最近这次古巴党代会上，正式批准了政府七十年代初以来进行的许多改革。

最先而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对工人阶级采取新的强制措施。现在不大强调依靠群众的热情，而是更多地依靠过去常用的、直截了当的强制。这与一九七三年决议的精神是一致的，决议恢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人都熟悉的那个惩罚制度：为了打击旷工、迟到和懒散以及不尊敬上级等现象，工厂可以惩罚工人，办法有扣工资、取消从事某些工作的资格、调离工作、推迟假期、暂时停职以至实际解雇。

个别制糖企业为了提高“生产力”，数年来一直在解雇工人。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在一九七二年的讲话中承认，在两个最大

的产糖省出现了某些完全失业的情况。如果贯彻党代会的精神的话,这种情况现在一定更广泛地出现在其它工业部门。

党代会的决议建立了一个正式体系,使古巴经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政府官僚和企业经理再也不能那么为所欲为,损害利润了。现在是要把整个经济管理得更加“有效”,每一项措施都一定要能产生利润。工人按其所在企业的利润率发给工资(目的是要使他们加紧干活,而不是使他们少受剥削)。企业经理也是按其所管企业的利润率来领取工资(使他们驱使工人加紧干活)。

古巴党的作用

古巴政府向苏修学到的经验远不只是“社会主义”版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在古巴共产党成立十年后终于决定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最好的例证。

古巴党在一九六五年建立时,主要是起形式上的作用。既然古巴假定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就必须有一个“共产”党。这是由三个组织拼凑起来的:卡斯特罗的“七·二六运动”、革命指导委员会(一个拿起武器反对巴蒂斯塔的学生团体)和人民社会党(一个老修正主义党,他们很早以前就放弃称呼自己的党为共产党,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反对对巴蒂斯塔进行武装斗争,甚至把一些学生战士出卖给巴蒂斯塔的警察)。这个新成立的党的领导成员很少碰头,几乎没有人民参加。总的说来,这个党主要是为了摆摆样子。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武器。只有通过由最有阶级觉悟的战士所组成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才能把千百万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经验集中起来,制定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前进的路线和政策。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得到群众的巨大支持;但是,既然他们从来没有以工

人阶级为基础，他们也就不需要这样一个党。

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新的买办资产阶级所得的经验，使他们更为“现实主义”地维护和加强他们的统治。他们所组织的并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原为买办资产阶级所创造，现在为它的利益和世界观所支配。党的领导人是国家、军队、工厂和农场的统治者。卡斯特罗向大会报告说，百分之四十的党员是行政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百分之十是教师和医务工作者。至于其余属于工厂和农场单位的党员，我们就无法确知究竟有多少是工人和农民，多少是技术人员和企业经理。但是，我们从他以前的、至少是从一九七〇年的讲话中知道，这些单位的经理和党的干部几乎总是老人马，而且在国营农场里，多半有一位是军官。

但是我们看一个政党代表什么阶级，主要不是看它的成员，而是看它实行什么政策，以及这些政策增进哪个阶级的利益。

卡斯特罗的“自我批评”

甚至卡斯特罗的所谓“自我批评”也是为新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他不久以前说，“或许我们最大的理想主义是相信一个刚刚勉强脱掉资本主义外壳的社会就能一跃而进入一个人人都能按伦理道德来生活的社会。”

在党代会上，卡斯特罗继续这一话题说：“革命通常有其空想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那些致力于把梦想变为现实、把理想化为实践的崇高事业的革命领袖人物设想着：历史的目标日趋临近，人的意志、愿望和意图能够无往而不胜。”

这正是一个新资产阶级对其年轻时代的真实回忆。他们起来掌权是开始于小资产阶级革命。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诸如优柔寡断、主观主义、理想主义、想入非非、变革心切而对斗争缺乏耐心等小资产阶级的缺陷，一切向往发财致富的以及反映其地位摇摆于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其他特性等

等，都反映在这个小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政策中了。他们在六十年代实行形“左”而实为守旧的路线，以及他们在重重困难面前突然转为公开的修正主义，就是他们世界观的反映。

理想主义的表现，决不象卡斯特罗要人们相信的那样，肯定不是过高估计人民群众。他们的真正理想主义表现在：他们认为，只要他们想改变社会，社会就能改变，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有意识、有组织的努力都是不需要的。这种观点，不仅反映在他们以前的理论中，即光靠“少数坚定分子”也能动摇美帝国主义在整个拉丁美洲的统治；而且也反映在他们目前的理论中，即不靠群众自己斗争，光靠苏联的贷款和他们的计划的结合就能给古巴带来社会主义。

他们要事物发生变革和认为事物能够变革，这不是理想主义。最理想主义的东西，即最脱离现实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古巴领导人不切实际地认为，他们能够保持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一方面使他们自己，即所有思想家、计划工作者、行政长官等等骑在人民群众头上；另一方面，使劳动人民甘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并乐意执行他们的计划。

十足的资产阶级

今日古巴的变化是什么？即表明古巴造反者已蜕变为新资产阶级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当他们还保持“社会主义”外表的时候，他们以资产阶级的办法管理社会的经验使他们学得了所有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和统治方法。他们并没有把自己过去的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转变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斗争性，而是把它转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历来用社会主义的词藻和假象作为统治的支柱，可是，他们现在以“市场规律”为依靠，以任意使用高压手段和绝对强制为后盾，驱使工人干活。

列宁形容小资产阶级对待被推翻的俄国统治者的态度时

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这也适用于古巴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

对他们来说，战胜帝国主义及其古巴的走狗并不为他们改变那产生新殖民主义制度的条件提供机会。相反，他们却变本加厉，以新形式取代被他们打倒的人。以他们自己的阶级观点为基础，加上苏修欣然提供的条件，使这些一度是小资产阶级造反者的领导人变成了依赖苏联帝国主义的十足的买办资产阶级。

最近数年，古巴与苏修集团的贸易额几乎和它与美国一度曾达到的贸易额一样。出口物资仍然占这个岛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而且大多数是糖），大部分产品运往苏联。

肥沃的土地限于生产蔗糖，食品却仍然必须向海外购买。这一事实一直拖住古巴经济发展的后腿。古巴对苏联的债务，现在已超过五十亿美元。为了还债，古巴正在打算用更大的努力来增产蔗糖。不久以前，古巴加入了“经互会”——苏联控制东欧经济的主要工具。这种依赖——负债——更依赖的无休止的循环，以及以单一农作物为中心的古巴经济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依赖于美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

古巴扮演的政治角色

古巴听命帝国主义经济学的摆布。目前它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政治角色，就是被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增进其在世界各地利益的工具和傀儡。

对于苏联，古巴是一个长期投资的场所，这比简单的直接经济利益要有利得多。可以想象，苏联的投资在短期内是赔钱的。但是这并不影响古巴对苏联的殖民地式的依赖。帝国主义大国经常使他们在任何特定国家的直接利益从属于他们的全面政策。以色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美国在以色列的投资有几十

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它希望从以色列一国的经济控制中所能榨取的。以色列对美国的真正价值首先在于使以色列充当一个政治和军事的傀儡，用它来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大量财产。

苏联帝国主义当然指望从它在古巴的投资中收回货币利润。但是古巴现在对它的真正价值却在于披上反对美帝的革命外衣，供苏联驱使，成为苏联取代美帝控制世界的重要工具。这一切都是在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美名下进行的。

“革命”的经历

古巴，作为一个曾进行过反对美帝的革命并且一贯竭力夸耀自己的“革命”经历的国家，能够在许多苏联自己不能那么公开出面行动的事情中，促进苏联的帝国主义事业。

古巴的部分汗马功劳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苏联帝国主义者打掩护，反击对苏联帝国主义者的揭露和谴责。

一九七三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古巴在这方面的效劳具有特殊的价值。当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抨击苏联与美国串通一气，侵略柬埔寨时，卡斯特罗站起来血口喷人，恶毒攻击西哈努克和其他人，他唾沫四溅、悲痛欲绝地为苏联辩护，并吹捧它是被压迫国家的坚定可靠的天然盟友。

今天，古巴领导人正在比以往更放肆更无耻地表演这一手。卡斯特罗在最近的党代会上说：“世界各地，真正的革命者，决不会因苏联的强大而懊丧，因为如果不存在这种强大……最近三十年为解放而战的民族就没有取得决定性援助的地方……而一切弱小的不发达的国家——这种国家有许多——就要再次沦为殖民地。”

隐藏在这句话后面的意思十分清楚：不发达国家如果不依靠苏联，就不能赢得解放。这种要全世界都仿效“古巴模型”的号召，是对苏联统治者的极有意义的效劳，因为苏联统治者正在

试图使被压迫国家反对美帝的斗争服务于他们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的目的。

然而，苏联统治者当然主要不是靠卡斯特罗的讲话来增进他们的利益。象美帝国主义一样，他们越来越多地依靠大炮。就在这方面，古巴领导人也领悟到苏联的“现实主义”妙处。

武装干涉安哥拉

近日来，古巴不再宣传代替群众自己进行解放斗争的“游击中心论”，而正在把自己的士兵装上苏联坦克和飞机，送到国外。

在安哥拉的成千上万驾驶着苏联坦克的古巴军队，仅仅是古巴统治阶级在实际战场上报答它的主子的许多活动之一。

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不只是一是要利用古巴军队把安哥拉置于它的铁蹄之下。他们还力图把这件事叫卖成“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甚至把古巴吹捧成范例，说什么只要其他国家把自己的前途与苏联及其援助结合在一起，它们就会得到巨大的幸福。可是，成千上万的古巴士兵被送去打仗并作为反革命走卒死去这一事实，是苏联帝国主义的大暴露。这是无论用什么言词也掩饰不了的。

苏联帝国主义者说什么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如不接受苏联的“援助”，不服从苏联的统治，他们就注定依旧处于奴隶地位。美帝早就把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作奴役和加强压迫许多民族的镣铐，它从自己的角度说着同样的话：如果被压迫和被剥削国家的人民敢于起来反对美国的“保护”和掠夺，它们将肯定成为苏联豺狼的牺牲品。

但是，可以从古巴革命失败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却是在这种帝国主义逻辑的反面。每个国家的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而且，推进解放全人类这一事业，不能依赖世界上剥削

者的“援助”，而只能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美国《革命》周刊
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资料室译)

卡斯特罗和古巴的苏联之路

〔美〕爱德华·冈萨雷斯^①

一九七五年年终前的几个月里，古巴再次成为国际上注意的中心。十一月首次透露，古巴的战斗部队已被派往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安哥拉，去援助这个国家的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有苏联支持的人民解放运动打内战。

等待已久的古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的召开，是具有更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古巴共产党公开露面十年后才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古巴报纸的极度重视，官方还特地规定一九七五年为“第一次代表大会年”。

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

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它把卡斯特罗的共产党政权描绘成确实是土生土长的古巴政权。为了使一九七〇年后这个政权所广泛采用的苏联式制度和做法得到民族主义的印记，这样一个做法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菲德尔在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主要报告中，详细回顾了古巴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历史，认为古巴的社会主义是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以及反对美国新殖

^① 冈萨雷斯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兼兰德公司顾问。本文的一部分引自作者和戴维·龙菲尔德合写的兰德研究报告：《革命后的古巴在一个动荡的世界中》（1975年12月）。

民主义侵犯的解放运动的继续。的确，在这一方面，他甚至追溯到古巴最受尊敬的诗人、人道主义者和独立运动领袖何塞·马蒂（“自由的鼓吹者”），把他同列宁及其革命贡献相联系，从而使古巴的共产主义神圣化。

这次代表大会还起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合法化的作用：在发出古共党内“老共产党人”作用增加的信号中，它颁发了古巴政权是马列主义政权的鉴定书，并且向莫斯科保证，古巴党是一个更可信赖的兄弟党。在过去，人们对卡斯特罗政权是否够得上称作共产主义政权是有所怀疑的。例如，一九五九年该政权的出现，并不是倾向于莫斯科的人民社会党的“老共产党人”夺权的结果，而是卡斯特罗“七·二六运动”的菲德尔派夺权的结果。人民社会党领袖原来认为菲德尔派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菲德尔派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宣布，古巴革命是“社会主义的”，但是在一九六五年以前，却不是共产党而是由菲德尔他们统治着社会主义的古巴。即使在一九六五年以后，他们在新成立的古巴共产党内，也是菲德尔他们的“新共产党人”占了统治地位。在由八人组成的政治局中，没有前人民社会党领袖；在由一百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中，前人民社会党领袖也只占二十二席；并且一般也不担任政府中的主要职务。

然而，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老共产党人”得到了他们渴望已久的突出地位，标志着“老共产党人”和“新共产党人”间有连续性的主张已成为古巴共产党具有马列主义的合法性的证据。菲德尔在他向代表大会所作的主要报告中，把古巴共产党一直追溯到一九二五年第一个古巴马列主义政党的创建。他声称，“老共产党人”过去一直高举“马列主义的崇高旗帜”，声称在许多方面，他们是后来成为“新共产党人”的年轻革命者的“思想方面的导师”和“鼓舞力量”。恢复“老共产党人”的地位，不仅仅是

象征性的。代表大会决定将政治局由八人扩大为十三人，布拉斯·罗加、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和阿尔纳多·米良这三个“老共产党人”都被提升为政治局委员。古巴共产党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在一九七〇年以后，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一九七五年九月底止，古共已有正式党员和候补党员二十万二千八百零七人。由于采纳了以“马列主义原理”为基础的，并强调“古巴共产党领导作用”的古共党纲，这次代表大会为古共的正统性增添了光辉。在建党整整十年之后，古巴共产党终于变为同苏共极为相似的政党了。

这次代表大会以前的各项准备以及代表大会本身，都想改变人们关于这个党是由少数优秀分子所统治、外人不得过问的形象，因而进一步增加了它的合法性。

这次代表大会的结果反映了国内外的力量在起作用。这次代表大会不仅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它还批准了将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五日提交公民投票表决的古巴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纲，这个党纲在一九八〇年第二次党代表大会批准“明确的行动纲领”以前，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这个党纲还建议在此期间要“创造性地”运用“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它还通过了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的五年计划，这个五年计划要求：年经济增长率为百分之六，同苏联进行更为密切的经济一体化，以及建立一个菲德尔称之为以各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做法为典范的新经济制度。总的来说，这次代表大会提供了一个为古巴领袖称颂苏联的国际性讲坛。例如，菲德尔在他的闭幕词中宣称，苏联是“一个给了我们国际主义伟大典范的和丰富教益的国家。尽管两国相隔千里，但苏联不容许帝国主义窒息我们，吞没我们和消灭我们。当帝国主义使我们得不到石油时，它把

石油输送给我们。当我们面临侵略威胁时，它把武器输送给我们。它还输送自己的人员来支援我国”。

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古巴革命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以前，菲德尔在他个人魔力般权威的基础上进行军事指挥官式的统治，菲德尔派完全控制了政府、党和军队，菲德尔主义，即游击队的激进主义，压倒了正统的马列主义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而且，直到一九六八年菲德尔赞同华沙条约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前，哈瓦那在外交政策方面常常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甚至与莫斯科相对抗。

一九七〇年的转折点

到六十年代后期，卡斯特罗政权已处于一种山穷水尽的地步；切·格瓦拉一九六七年死在玻利维亚，支持拉丁美洲武装革命已不再是一种有效的政策；古巴经济动荡，迫使哈瓦那以停止执行同莫斯科相对抗的政策，作为加速苏联经济支援的条件；国内群情不满和情绪低落的情况有日益增长的迹象，特别是工人旷工率日益上升。完成一九七〇年规定的收获一千万吨糖的目标成了这个政权全力以赴的事情。他们把达到这个创记录的收成（历史上的最高记录是一九五二年的七百二十万吨）看作是：可以重新鼓起公众情绪；可以重新对苏联集团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并可以表明菲德尔政权的经济效率，从而摆脱来自国内外的尖锐批评；最重要的是，它会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个人魅力的权威重添光辉。

因此，最高领袖公开地把自己的声誉押在支持这一政策上，并坚持说一千万吨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同时，他把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本、运输设备和人力全部集中于产糖部门，还动员了七

万以上的革命武装部队的成员，以期达到一千万吨的目标。但是，实际收获比规定目标短少了近一百五十万吨。更严重的是，过分注重糖的生产，导致了其它经济部门生产的严重下降。因此，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庆祝革命胜利的大会上，古巴最高领袖对国家经济的瘫痪情况，公开地承担了责任，承认自己“无知”，不能创造出“奇迹”，并退而承认有进行行政管理方面重大改革的必要性，以便刺激这个岛国的经济恢复。

一九七〇年的收获量不足和经济失调，加上卡斯特罗七月二十六日的讲话，为“革命的制度化”扫清了道路。在苏联的指导下，这种制度化需要对菲德尔的权力从制度上规定一些限制，以及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要规定正常的程序。首先，它意味着政治权威从个别领袖转到了党和政府。

苏联影响的扩大

即使在党代表大会以前，苏联干预古巴事务的影响，已间接地通过前人民社会党党员在党和政府统治集团中作用的增加而加强了。最重要的是，前人民社会党党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在这次古共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政治局委员。他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开始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当时他被委派为苏古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古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在将近两年之后的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他作为主管对外经济、政治事务的副总理而参加部长会议所属的新执行委员会。罗德里格斯极其干练、温文尔雅和讲求实效，显然是菲德尔和苏联人都信得过的前人民社会党少数领袖之一，的确，他很可能就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前人民社会党总书记布拉斯·罗加是被这次代表大会提到新政治局的另一“老共产党人”。由于他担任了一些古巴

专门委员会的主席，在马坦萨斯省负责人民政权的试点，在一九七三年负责过古巴法律制度的变革以及参加了古巴新宪法的起草工作，最近几年来，他已获得显要地位。在这次古共代表大会前被委派要职的前人民社会党党员还有：伊西多罗·马尔米埃尔卡，他在一九七三年二月成为书记处书记；还有弗拉维奥·布拉沃少校，他被委派为主管消费品和国内贸易的副总理。

同时，古巴同苏联阵营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增长，为莫斯科提供了施加更为直接影响的手段。苏古经济、科学和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就是这样的一条主要的渠道，它是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作为两国经济计划的协调机构而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成立十五个月之后，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说：“我国国民经济中没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门不是已存在或者计划要存在这种（同苏联的）合作关系的。”一九七二年七月在莫斯科宣布了古巴已被接纳为经互会的正式成员之后，古巴同苏联集团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了。到一九七四年初，罗德里格斯证实，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〇年古苏两国的五年计划已分别由古巴的中央计划委员会和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进行了协调工作。

这些措施扩大了这个岛国早已极端依赖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有一个观察家作了这样的评述：“一九七二年，古巴对苏联的依赖，看来已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了。大约百分之六十的古巴贸易是对苏贸易，对经互会各国的贸易共占百分之七十。这个数字大抵同五十年代古巴同美国贸易的比重相当。……由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蔗糖作物歉收（以及一九七一年烟叶作物歉收），到一九七二年为止，古巴对苏贸易的累积亏空数字可能已达三十亿美元。一九七二年，古巴对苏债务总额约近四十亿美元。”

作为一个仰赖别国的债务国，当一九七二年末菲德尔在莫

斯科签订了新的长期苏古经济协定时，古巴处境的恶化暂时得到了抑制。按照协定，古巴对苏的庞大债务被延期到一九八六年开始偿还，在此以后，就分二十五年无息偿还。此外，苏联人还提供了新的贷款以弥补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之间的贸易逆差，这笔贷款也在一九八六年以后无息偿还。苏联人还同意对食糖每磅出价十一美分（比当时的世界市场价格高出二美分），对镍和钴每吨出价五千万美元。结果，一九七二年协定以后，古巴对苏贸易急剧上升，从一九七二年的十亿零二百万美元，增至一九七四年估计约为二十一亿一千万美元。此外，一九七四年，尽管古巴发展了同非共产党国家的贸易，苏联对古输出仍为古巴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八，这一情况反映古巴在世界市场上是抛售了大量食糖。

然而，哈瓦那对莫斯科一九七二年协定的慷慨解囊是付出了代价的。首先，到一九八六年为止，古巴的经济实际上被抵押给苏联了，因为到那时，古巴必须发展新的工业和农业的能力，以便能偿还它积欠的债务。同时，与苏联签订的各项协定，使哈瓦那不能在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五年间通过兴旺的世界市场出售为数更多的食糖来大力减少它的现有债务（估计一九七四年债务已达四十三亿美元）。即使在一九七四年调整糖价为每磅二十美分之后，苏联的出价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市场价格，到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世界价格已达到每磅六十六美分的历史高峰。

通过在岛上派驻了大约六千名的顾问，这就进一步为苏联人提供了保险因素。其中，三千或者还要多一些的人是非军事技术人员和专家，他们在各经济计划机关、各个部和企业中任职。

新的苏联式的正统道路

关于菲德尔派后退的问题，即使在这次古共代表大会之前，古巴已经对莫斯科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让步。到这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古巴早已在国内外政策各方面进入了苏联的轨道。

菲德尔派首先放弃的一个见解是，通过道德鼓励和提高自觉性的办法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主张意味着，由于苏联人对苏联工人使用物质刺激，苏联人没有全心全意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而古巴实际上将首先到达“真正共产主义”的最后阶段。然而，到一九七一年底时，卡斯特罗政权已站到苏联一边去了。多尔蒂科斯总统承认，苏联是处于共产主义太平盛世之前的最高阶段（即“建设共产主义”阶段），而古巴则仍然停留在远为低的发展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阶段。

这种思想意识方面的后退，影响着主要的国内政策：它导致古巴放弃了菲德尔派六十年代后期强调道德鼓励的经济，而采取了同古巴“建设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苏联的各种经济措施。例如，古巴人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实行货币交换和进行成本核算是必要的，而不再继续执行他们那些逐步淘汰货币的计划。古巴政权现在废弃了道德鼓励和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政策，以促使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举行的、为期五天的古巴工人中央工会第十三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某些政策方面的让步被公开地阐明了。

事实上，古巴工人中央工会代表大会所进行的讨论和作出的决议，预示着在古巴经济和劳工事务中，要用苏联的正统方法来完全代替菲德尔派的做法。菲德尔亲自在闭幕演说中对他过去的做法给了最后致命的一击。最高领袖现在承认，古巴仍在

“建设社会主义”，承认由于古巴人民缺乏社会纪律，他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的准备；还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他强调指出，如果古巴的经济制度要能促进更大的储蓄、更多的生产、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更严格的工作纪律的话，它需要新的更高的效率。具体说来，这意味着在所有的工厂企业中推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在工人中按技术水平建立等级工资制；采用物质刺激，以奖励工作表现好的工人；重新采用工作定额，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还要加强国家企业的管理。

在外交政策方面，也同样地追随苏联的政策。这点，也变得明显了。从一九七〇年开始，菲德尔本人就充当了苏联在第三世界最坚定的拥护者。在一九七三年九月阿尔及尔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上，他出来抨击两个帝国主义的理论。哈瓦那对拉丁美洲的新政策也是支持苏联利益的；古巴政府开始对武装革命默不作声，也不再对游击小组进行支持，这样，它就不再构成苏联扩大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关系的障碍了。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一、二月号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 辛斐译）

同赫鲁晓夫摊牌

〔美〕肯尼思·奥唐奈等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当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谋士。从这篇古巴“导弹危机”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色厉内荏的本质。

古巴导弹危机解决之后，长期使肯尼迪困惑不解的一个大问题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玩那一危险的赌博，把进攻性核武器弄进古巴？赫鲁晓夫在一九七〇年的回忆录中声称，他从来没有发射导弹的任何打算。他说，他之所以在古巴设置核武器，只是要恫吓美国，使它达成一项不入侵卡斯特罗的岛屿的协议。虽然他坦白承认，他后来的投降和撤除导弹，使他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古巴人面前丢了脸，他还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肯尼迪总统从不认为，设置这些导弹当真就改变了军事力量的对比。他知道我们拥有压倒的军事优势。他看到俄国人的疯狂行为不免有所担心，因为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这是对美国在北约组织的可靠地位的直接冲击，而且我认为，这最主要的还是想破坏肯尼迪所看重的那项把拉丁美洲与美国拉在一起的计划。作为自始至终和他坐在一起进行讨论而最后产生了“争取进步联盟”的一分子，我知道他对过去的错误是很敏感的，而且一直在设法弥补这种错误。如果屈从苏联的侵入，将会是心理上的一种重大打击。

不管赫鲁晓夫是怎么想法，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初，苏联似乎不可能在古巴设置进攻性导弹，因此，肯尼迪总统认为，基廷和凯普哈特对这件事的指责，不过是共和党人的一种竞选饶舌而已。我们曾经热烈地讨论过他应如何回答他们的攻击。我主张，对于古巴是否会是对美国安全的一种威胁，民主党人应该完全不理睬它。我坚持认为，一般选举人不会很注意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芝加哥和匹兹堡的人民对充分就业和医疗福利方案，比之争论苏联在加勒比的导弹是防御性的还是进攻性的，看得紧要得多。“但愿你是对的，”肯尼迪说，“但是，我很怀疑。”

星期日，两架U-2飞机拍摄了圣克里斯托瓦尔附近的进攻性导弹基地。当天上午的报纸却登载了前一天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竞选演说的报道，把凯普哈特立即入侵古巴的要求奚落了一番：总统说，“这些自封的陆、海军将军，总想把别人的孩子送去打仗，选举人应当要他们呆在家里，而由象伯奇·贝赫这些多少懂得一点二十世纪究竟是怎么回事的人去代替他们。”后来他对我说，“你喜欢那个演说吗？”我说，他比往常叫得更响，但是，如果他定要降低身分去回答人们对古巴问题的指责，那当然要这样做。

星期二，我正站在我的办公桌旁看报纸，等待一天工作的开始，这时，总统从他的办公室出来，对我说，“你还是认为在古巴问题上的鼓噪不重要吗？”

“肯定是这样，”我说。“选举人才不在乎古巴的事哪，你谈论古巴问题是在浪费时间。”

“你真的以为它没啥了不起吗？”他说。

“总不象竞选中提出的问题重要吧，”我说。

他招呼我跟他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说，“我想让你看点东西。”

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些U-2飞机拍摄的放大照片，可以看到在一块森林地区有一处空地，在那儿的建筑工地周围，有几顶篷帐和一些卡车、拖车及一些胡乱涂写的标记。他用放大镜看了其中的一张照片，对我说道，“你是一个空军轰炸老手。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是一个正在开始构筑的中程弹道导弹基地。”

我觉得我自己的脸发白了。“我不相信”，我说。

“你还是相信的好，”总统说。“它是星期日拍的，昨天又反复核对过。我们在印第安纳州刚好选上了凯普哈特，而肯·基廷也许将是美国下届总统。重新安排一下时间表，好让我们能够在十一时四十五分在内阁会议室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会议。有关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对任何人都一个字也不要吐露。今天所有其他的约会，一概不变。我们要做到，看起来好象这里的一切，一点也没有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将近正午，他同经过慎重挑选的人数有限的官员和顾问在内阁会议室开会，这些人除了少数军队司令和情报专家，都是政府内部的人。一星期后，在总统公开发表给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之前，他们都是知道已发现古巴有导弹这个秘密的一些人。

这个讨论小组后来称为“执委会”，或者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其成员除了总统和副总统，还有国务院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副国务卿助理亚历克西斯·约翰逊，拉丁美洲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和卢埃林·汤普森；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部长助理保罗·尼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康和马歇尔·卡特将军；白宫工作

人员麦乔治·邦迪、特德·索伦森和我本人。在总统邀请下，迪安·艾奇逊，艾德莱·史蒂文森和罗伯特·洛维特也出席了后来的一些会议。美国新闻署副署长唐·威尔逊代替生病的埃德·默罗应邀出席。奇普·波伦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但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在第二天离开会议，奔赴新的岗位就任驻法国大使去了。

在导弹危机期间，这些人大多每天碰头。起初是为了提出行动方针的建议以供总统选择和遵循而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辩论，后来则是讨论对付赫鲁晓夫的报复手段的办法和对付他对总统的要求所作的答复的办法。总统本人并没有出席所有的执委会会议。部分原因是为了在严守秘密的第一周内，他得实践他正式的约会和参加竞选活动，以便装出一副全然不理睬苏联人的样子。总统断定，他不出席主持会议，可以使会议的讨论更加自由，更少禁忌和更为有效。迪安·腊斯克怕长期不在其他公务中露面将会引起人们的猜疑和影响保密，因此，有几次会议也只得缺席。但是，他能经常密切地了解会议的进展情况，并且在通过争论得出初步结论和提出了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后，参与总统的重要决策。

我的名字虽然也属于严加限制的执委会名单之列，然而，我并未参与任何一次讨论策略的会议，我只出席一些有总统在场的会议。总统指派我的任务是观察和听取会议的进展情况，便于他能在事后和我谈论会议上谈过的情况，并把他的印象和结论同我的看法加以比较。他需要在会议室里有一个观察员，这个观察员多少能够客观地倾听各种各样的辩论，而无需卷入任何纷争，或对任何观点承担责任。我出席了那些历史性的会议，留心观察了一批具有高度才智以及在行政和外交上极有经验的人物如何第一次同武装威胁美国的敌人暗中进行较量的情况。

看到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压力下面表现了游移不定，有些人则没有能力作出思考周密的判断并坚持下去而在第二天又不得不冲动地改变了主意，这种情况，使我大为吃惊。过去，我一直钦佩肯尼迪总统，在两个星期的古巴导弹危机会议期间，我更以全新的眼光来看待他了。同委员会中的其他许多成员相比，他象岩石那样突出，具有坚实可靠的判断力，毫不动摇的和坚定的态度。博比^①和我后来经常在想，在那个严酷的时刻，如果执委会中另一个成员是总统，可能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博比认为，那个小组中至少有六个人会激起赫鲁晓夫发动一场灾难性的世界核大战。另一方面，博比又认为，苏联国家领导人如果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别的什么人，世界也许会毁灭了。

肯尼迪总统自己后来说，假如我们被迫迅速作出如何搞掉古巴导弹的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就大有可能选择一种错误的、灾难性的行动方针。中央情报局的照片释读专家们在星期二的第一次执委会上汇报的主要内容是，导弹基地距离完工时间看来至少还要十天，因此，我们几乎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用来进行考虑从而确定该怎么办。这段可以考虑和权衡各种选择的时间，使总统和博比得以在麦克纳马拉和吉尔帕特里克的支持下，劝说该委员会赞成对古巴进行海军封锁，而不是采用直接空中打击。而在讨论之初，大多数成员，包括泰勒将军、尼采、狄龙和艾奇逊等人在内都要求进行直接空中打击。海军封锁的想法——最后证明是挽救危机的办法——在星期二上午的第一次会议上，甚至连谈也没有谈过可以作为一种可能的办法。直到当天晚上再次召开执委会讨论时，还没有考虑到这种想法。而且直到星期四和星期五，这种想法也还没有获得实际上的支持。

① 即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的爱称。——译者

一直到星期日，即总统在电视上露面宣布封锁并要求撤除导弹的前一天，他还在与仍然主张空中打击的空军领导人所持的反对意见进行斗争。毫无疑问，如果当时总统在发现导弹后二十四小时内必须坚决作出决定，那他就将在严重的压力下，下令从空中突然袭击古巴，接着就非得入侵古巴不可。但是，有了这几天给他考虑其他策略的宽裕的时间，就使他有可能来制定一项封锁计划，一项对付赫鲁晓夫的强硬而又富有戏剧性的行动，但却仍然是一种使苏联领导人能够从战争边缘退缩回去的软硬之计。

在星期二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统强调，在我们正在考虑和商定一项行动方针期间必须绝对保密，因为他必须在导弹基地可以使用之前采取一种富于战斗性的和经过周密部署的行动使赫鲁晓夫吃个冷不防。这就排除了采取诸如向联合国或向我们的北约组织进行呼吁那种外交的或政治的途径。因为，等到我们通过外交渠道提出控告时，导弹基地的工程已将竣工，导弹也随时可以发射了。既然出其不意就是我们对苏威胁的精神所在，因此大家一致同意，总统必须保持一副照常工作的样子，一直到要发表最后通牒时为止。这就是说，在那个星期的余下的几天里，当执委会的顾问们还在就采取封锁还是空中打击的做法上争论不休，U-2飞机正加紧在古巴上空拍摄照片时，总统仍将在康涅狄格和伊利诺斯发表竞选演说。而且在十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五时，他仍将按照原先的约定，同安德烈·葛罗米柯在白宫会晤。

决定让总统在那个紧张的一周的余下的几天里去应付他所承担的政治运动方面的义务，这至少对我说来如释重负。我们曾经满口答应理迪克·戴利市长，总统星期五一定会在芝加哥露面，以便为支持议员锡德·耶茨发表演说。

在第一次执委会会议上，当提出了总统是否还应继续进行竞选活动的问题时，我吓得屏住了气。肯尼迪转过头来滑稽地对我笑笑，说道，“你取消了芝加哥之行了吧？”

“我什么也没有取消，”我说，“我不愿意当一个不得不告诉迪克·戴利说你不准备到那儿去的人。”

总统和在座的其他几个人一齐哈哈大笑，并立即向我保证，作为保密掩护，芝加哥的约会一定得遵守。

当天晚些时候，总统继续维持了惯常的工作日程，对一群正在国务院出席外交政策会议的社论作者和电台、电视台的评论员讲话。他讲话时的感情比猜疑有核战争危险的任何听众的感情都深刻得多。“我并不认为，目前美国以及全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最关键的时期的说法是不正当的，”他说。“第三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大战没开始前，我们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我国的存亡问题，保护我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他背诵了一首诗来结束他的谈话，这首诗反映了他当时准备单独承担责任的异常强烈的感情，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编辑和评论员对此颇感兴趣：

斗牛的评论家一排接一排，
把那个大广场挤得水泄不通；
只有一个人得悉个中奥妙，
一切都在那个斗牛士自己的心中。

第二天早晨，星期三，邦迪和麦康给总统看了新从古巴弄来的、更加清晰的照片证据，照片上展现了一些可以看得出来的导弹和至少有二十八个可以发射中程与中远程弹道导弹的建筑基地。中程导弹可飞行一千哩，或者可以远达华盛顿或圣路易；而中远程导弹射程超过二千哩以上，携带比我们在广岛投下的原

子弹大四倍的核弹头，可以打到纽约或芝加哥。总统那天上午晚些时候告诉我，我们的情报人员估计苏联人正在古巴建造的基地，只要一齐射出一次导弹，就可以杀伤八千万美国人。

总统心里怀着这种可怕的负担，在十时走进内阁会议室，耐心地接见了西德外长格哈特·施罗德博士达一个半小时之久。在总统去参加利比亚皇太子在利比亚使馆举行的答谢午宴前，他同戴夫一道在游泳池进行了他的例常午泳，并要戴夫同他一道驱车去利比亚大使馆。途中，他们在圣马丁教堂停了下来。“我们进去作一次祈祷，”总统说。这时戴夫对古巴导弹的事还一无所知，因此去访问这座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不免使他感到惊奇，而总统却很欣赏他那惶惑的神情。他说，“你忘了我宣布过今天是‘全国祈祷日’吗？这会儿我们需要一切能够找到的祈祷者。”肯尼迪似乎显得格外虔诚，或者他需要显得这样。

当天下午，总统飞到康涅狄格，为阿贝·里比科夫进行竞选。

正当总统在康涅狄格进行竞选活动时，在国务院乔治·鲍尔的办公室里，执委会小组正在进行一次激烈的会议。总统早已料到，古巴导弹危机的讨论不会象猪湾入侵前的一些会议那样容易取得一致意见，那时，在各次会议中都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过一句不赞成的话。执委会的这些会议，没有主持会议的官员，没有条条框框，不问等级，各人都可以自由发言。军官们同国防部长激烈争论。副部长同部长们还有副部长之间意见也相互抵触。我们后来听说，那个星期三，博比·肯尼迪曾同迪安·艾奇逊大吵一顿。力主采取封锁行动的博比坚决认为，对古巴进行空中突然袭击会成为一次珍珠港式的欺骗手段，从而有损美国的声誉，其语气之激烈，使室内大多数人为之震惊。“我们不想让我的哥哥成为六十年代的东条，”他说。艾奇逊，这个坚决反

共的杜鲁门主义的创始人，指责博比把古巴同珍珠港相比，完全是胡说八道。艾奇逊宣称，门罗主义和肯尼迪总统九月份反复申明美国将被迫搞掉苏联人设置在古巴的进攻性导弹的预先警告，都是足以进行空中打击的正当理由。博比就大国对独立的小国进行偷袭的道义问题继续进行了抨击。经过他不断的斗争之后，终于使这个小组几个原来赞成空中打击的成员转变了态度。改变看法的有泰勒将军、道格拉斯·狄龙、保罗·尼采和麦乔治·邦迪。“我要求过进行空中打击，”狄龙后来说，“是博比·肯尼迪的论据使我改变了主意。他说，作为美国人，我们应当对自己老老实实，搞突然袭击不是我们的传统。老实说，在博比如此雄辩地提出这些问题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

除了这个道义问题，总统本人也怀疑采用空中袭击作为迫使撤除导弹的第一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现实。首先，他很清楚，从空中进行一次打击，不可能摧毁全部导弹基地，而肯定会杀伤一些配置在这些基地上的俄国人。正如汤米·汤普森指出的，俄国人在古巴死亡，将迫使赫鲁晓夫从那些幸存下来的，还可使用的导弹基地上袭击美国。同时，进行了空中打击后，势必又须使用军队入侵古巴，而搞一次入侵又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看来，作为第一着，海军封锁更为可取，这不仅因为它可在未开火之前给赫鲁晓夫一个后退的机会，而且还因为一旦海军封锁没有产生任何结果的话，可以继之以发动军事进攻。但是，空军部队却认为，到了试图用海军封锁而未能取得成效的时候，苏联的导弹早已随时可以使用了。总统也认为空军这个论点是站得住脚的。

星期四上午，在总统出席的一次执委会会议上，固执的空军参谋长柯蒂斯·李梅将军力主尽快进行空中打击。

总统问他：“俄国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李梅说，俄国人一点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应。

“你真的这么想吗？”肯尼迪说，“你是想告诉我，他们将让我们去轰炸他们的导弹，杀害许多俄国人，而他们却一点也不作出反应吗？即使他们在古巴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们肯定也会在柏林搞点什么名堂。”

会后，总统对我说，“你能想象李梅会说出那样的话吗？在这些将军的意见里有一点是极其有利于苏联的。如果我们听从他们，并按照他们要我们做的去做，那么，以后我们就没有一个人会活下来对他们说他们错了。”

星期四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当安德烈·葛罗米柯按预先约定来到白宫同总统会晤时，还没有肯定排除对苏联导弹基地进行突然空中打击的可能性。因此，当葛罗米柯一本正经地向他保证，苏联人并没有把进攻性武器弄进古巴的意图，俄国送给卡斯特罗的武器只是为了防御的目的时，总统只得坐在他的摇椅里，有礼貌地听着他讲。“我真想把我们的证据摊给他看，”肯尼迪后来说。不过，当时就那样作，将会使我们失去搞第一次突然行动的机会，这种突然行动能使赫鲁晓夫处于不利的地位，并把他正在干着却又假装没干的事暴露在全世界面前。要是星期四那天肯尼迪向葛罗米柯宣布自己的意图，那么，在他准备好一项公开要求撤除导弹计划之前，俄国人就可能首先宣称受到威胁，并提出要求，从而使我们处于守势。

因此，总统听着葛罗米柯谈论柏林问题，以及俄国可能与东德签订一项条约的问题——这是他们进行会晤的表面上原因——继而又谈到古巴希望能和平共处。这时，总统却在竭力抑制那种让这位苏联外交官看一看我们的照片的诱惑。肯尼迪向葛罗米柯朗读了他的九月四日的警告：美国将对把进攻性导

弹引进古巴，采取行动。“实际上，我对他说，最好是古巴什么导弹也没有，”总统那天晚上说。“而他告诉我说，赫鲁晓夫脑子里从来没有起过这种念头。我竟然坐在那里，听着谎言从他嘴里出来，真是令人不能置信。”

第二天上午，当总统离开华盛顿，到克利夫兰和芝加哥作原定计划的竞选旅行时，他肯定已下了决心，要用海军封锁古巴来开始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了。下个星期一晚上，他将在电视台向全世界宣布这件事。他说，看来封锁是很有力的第一着棋，很少有直接引起一场大战的危险。尽管他已作了决定，他还是需要获得执委会成员的一致支持。星期五那天早晨，在我们去机场之前，他告诉博比：“如果你碰到什么困难，打电话给我，我将取消旅行，回来同他们谈。”

我对他说：“如果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又将怎么办呢？”

“不管怎样，我将自行作出决定，”总统说。“负责的只是我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做我要做的事情。”他讲了一个关于亚伯拉罕·林肯召开内阁会议的故事，说，“当时所有的人都投了赞成票。”整个内阁都投了赞成票，而林肯却投了不赞成票，于是，他宣布不赞成票通过。

当我们在芝加哥到谢拉顿—布莱克斯通大旅馆办理登记手续时，皮埃尔·塞林格到我们房间来告诉总统说，罗伯特·艾伦和保罗·斯科特即将在他们的华盛顿专栏中发表一篇有关入侵古巴的文章，而《芝加哥太阳时报》的卡尔顿·肯特则在打听关于一支伞兵部队已待命在古巴降落的消息。

直到那时为止，关于导弹危机的秘密还一点没透露出去，着实令人惊异不止，这部分是由于政治运动分散了新闻界的注意力。甚至象《纽约时报》的斯科特·赖斯顿这样的人，他在政府中的消息来源一向比大多数记者要多，所处地位也比他们高，但

是，直到星期六，即发现导弹后的第五天，他还没有听到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曾一直设法使塞林格蒙在鼓里，但是，那天晚上在芝加哥，情况明摆着，我们已无法再对他保守秘密了。在皮埃尔报告入侵的谣传时，我可以看出，总统正在暗暗咒骂参谋长联席会议。

“打电话给肯特，告诉他那篇报道完全是错的，”总统对皮埃尔说。“我们并没有入侵古巴的计划。”他要我打电话给麦克纳马拉，叫他要艾伦和斯科特不要把他们的专栏文章付印。我照办了。他叫我留在旅馆的房间里与华盛顿保持联系。戴夫答应同我作伴。总统去赴宴之后，皮埃尔回来了，神情惶惑，设法说服我让他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现在所能告诉你的是，”我说，“总统明天可能要伤风。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只得取消余下的旅行，回华盛顿了。”

我们曾经商定，编造一个感冒的故事作为掩护，而且在华盛顿时我已同迪克·奥里尔作了安排，必要时五分钟前通知一下就取消余下的竞选旅行，而不得追问什么原因。那天晚上，我们在等待总统从聚餐会上回来时，我同博比、腊斯克和邦迪都通了电话。当天晚上大可不必让他匆匆赶回华盛顿，但是他必须在明天一早回去。保密工作已开始垮了，军方仍有很多人反对封锁，而总统向全国和世界发表的要求撤除导弹的演说，还得在星期一之前写就并加以批准。同时，还需要把正在全国各地休假和竞选的国会领袖们召集拢来，在总统广播宣布之前，对他们秘密进行一次情况介绍。总统在十时三十分左右回到我们的旅馆房间时，他给博比打了电话，同意明天早晨返回华盛顿。他要我同陪同我们一起旅行的白宫医生、海军少将乔治·伯克利联系，请他明天早上来给他治感冒。

第二天，星期六，总统醒来之后，我们就由伯克利少将站在

总统床边，还唤来了皮埃尔而上演了一出戏。“我有点感冒发烧了”，肯尼迪郑重其事地对塞林格说。“告诉新闻界，根据伯克利医生的建议，我将返回华盛顿。”皮埃尔刚要离开时，肯尼迪又把他叫回来，并对他说，“把这个带着。我们最好一定要做到我们全都口径一致。”他伸手取过一本电话记录本，在上面写着，“上呼吸道轻度感染。体温高一度半，天气阴冷，有雨。建议回华盛顿。取消原定计划。”

为了应付记者，那天早晨，总统戴了帽子，登上空军一号座机。这是在他就职时戴了一顶丝质大礼帽以来，第一次头上戴着东西在公开场合露面。只有《华盛顿邮报》一位机警的编辑注意到，当天正在夏威夷参加竞选活动的林登·约翰逊也因突然患了感冒而中断了他的日程表，匆匆忙忙赶回华盛顿。那个编辑打电话问塞林格，这是不是一种流行病，或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皮埃尔未作解释。

星期六那天下午，在白宫楼上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召开了一次执委会会议。在那里，总统宣布了他要在下周内使封锁付诸实施的决定，并进行了讨论。腊斯克早先赞成进行空中打击，这会儿支持了总统的决定；麦克纳马拉也支持总统，他过去一直是赞成封锁的。总统冷静而又镇定地说明他已打定了主意，他决定采取除军事袭击——以后如有必要，可以采取——以外的最不妥协的行动，以迫使赫鲁晓夫撤除导弹。接下来，艾德莱·史蒂文森讲了话，他一个人大胆地对总统拒绝妥协的态度表示了怀疑，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史蒂文森问道，如果从古巴撤除苏联的导弹值得花任何代价，那我们为什么不能用从土耳其撤除雷神导弹和关闭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来作为交换呢？他说，如果它能使世界避免一场核大战的话，任何类似的外交买卖都是值得考虑的。

史蒂文森遭到了狄龙、洛维特和麦康的严厉批评，当时要是迪安·艾奇逊出席了那次会议的话，他也必定会遭到艾奇逊的粗暴对待。由于总统不赞成空中打击的建议，艾奇逊一气之下，已于前一天离开了执委会，这时正在马里兰他的田庄上生闷气。总统向史蒂文森解释说，由于俄国人这种欺诈手段，一方面偷偷摸摸把进攻性导弹运进古巴，一方面又抗辩说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企图，他认为不应对他们作出任何让步。而且，肯尼迪又说，拿雷神导弹来作交易将对北约组织联盟产生分裂的结果。戴高乐就会立即指责美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在一次交易中出卖它的欧洲朋友。

散会时，总统同博比和我一起走到“杜鲁门阳台”上，同我们谈到会上所说过的一些话，特别谈到艾德莱所说过的话。博比对史蒂文森提出与赫鲁晓夫妥协感到非常恼火。“在这样一个时刻，他既不坚定，又不强硬，不能在联合国代表我们了，”博比对总统说。“为什么不叫他离开那儿，让约翰·麦克洛伊那样的人去替代他呢？”

“等等再说吧，”总统说。“我认为艾德莱表现了很大的勇气和力量，冒着被人称做姑息者的风险而提出那种观点。这是一种必须把它讲出来的论点，但是，还没有另外一个有勇气的人来把它讲出来。他建议放弃关塔那摩也许太过火了。但是别忘了我们现在正处于可能牺牲我们千百万人生命的局势之中，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局势的各个方面，并想尽一切办法来摆脱这种局势。我很钦佩他说出了要说的话。”

当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和查尔斯·巴特利特后来为《星期六晚邮报》写了一篇关于导弹危机会议的文章，把史蒂文森写成是在同赫鲁晓夫谋求一项“慕尼黑”协议办法时，总统深感不安，大为恼火。由于巴特利特是肯尼迪家的一个密友，人们会认为

那篇文章是得到总统同意的，而实际上他却是坚决反对的。直到那时为止，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欣赏史蒂文森的人，但是，我觉得，肯尼迪总统也觉得，艾德莱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议上乐于采取赞成妥协的立场，是表现了华盛顿所少见的一种无私的政治胆识。

会后，总统同我们在阳台上谈话。他说，史蒂文森所强调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他认为，既然我们还在靠近俄国边界的土耳其保留着我们自己的雷神导弹，许多外国观察家就会怀疑我们是否有权要求从古巴撤除苏联的导弹。这个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和使人恼火的一面是，从军事上讲，雷神导弹或多或少对我们已毫无用处，这种以陆地为基地的武器的作用，老早就被更机动的潜艇北极星导弹所代替了。

星期六那天下午，当肯尼迪总统准备发表他给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时，他显得有点儿神经紧张，这是我们在整个十三天导弹危机期间所看到的仅有的一次。他打电话给带着卡罗琳和约翰正在格伦奥拉度周末的杰基，要她带着孩子当晚返回白宫，以便突然发生紧急事件时，他能和家人在一起。情报官员曾经向我们指出，假如俄国人知道肯尼迪总统发现了导弹和要求撤除导弹的计划，赫鲁晓夫可能会下令对华盛顿进行一次突然的核袭击，想一下子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总统已挑选了一批人，以便万一发生危机时他们可以同他在一起，并由总统的海军副官泰兹韦尔·谢泼德司令负责后勤。谢泼德把白宫的疏散计划告诉了戴夫和我，还交给我俩每人一张粉红色的身份证，说明我们都是属于将随同总统夫妇到城外某一未指明地点的地下掩蔽所去的一批人。谢泼德给我看了在白宫疏散后将同总统在一起的全部人员名单，我记得看到了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特德·索伦森等人的名字，其他的名字，则

因时间久了，都忘记了。

当戴夫拿到他那张粉红色的证件时，他走来对我说：“在你我同总统到那个地下室去后，我们的妻子儿女怎么办呢？”无论是谢泼德还是我，都不知怎么回答他。在那个周末的晚些时候，我的妻子海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在杰基和肯尼迪的子女于星期六那天从他们在弗吉尼亚的周末休息所回到白宫后，总统按例同戴夫一起进行他们的晚泳。游泳时，总统谈到了危险的局势和一场世界核大战的危险。当时他的心情和所用的词汇，几乎都同在与赫鲁晓夫举行维也纳会议后，在飞机上同我谈话时一模一样。“戴夫，要是我们只是想到自己的话，那倒是容易的，”他说，“但是我一直在想着那些生命就要完蛋的小孩。”后来，戴夫带着总统当晚要研究的报告文件夹到官邸楼上的房间去。他刚要走进那灯光暗淡的起居室把文件交给总统时，戴夫听到了他悄悄的谈话声，还以为他独自在跟什么人通电话哩。接着，他看见总统坐在椅子上，膝上坐着卡罗琳，正在给她念一本故事书。

“我看着他同卡罗琳坐在那儿，”戴夫后来跟我说。“我不禁想起了他在游泳池中跟我谈过的话，说他多么担心世界各地的儿童，而且你知道，我当时还产生了一种最为奇特的感情。我把文件交给了他后，尽快地离开那里。我简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当天晚上，海伦和我应邀参加了吉姆·罗家的一次舞会。这是属于一种盛大的舞会，在那里几乎可以见到华盛顿所有的要人。后来据说总统之所以命令我去参加罗的舞会，是怕我不出席会引起猜疑。但是，总统对他的助手们星期六晚上倒底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度过的，却并不感到兴趣。我则不过是决定那天晚上宁可同一些意气相投的朋友一道喝上一杯，而不愿意呆

在家里，守在电视机旁。艾德莱·史蒂文森也出席了舞会。

大约半小时后，史蒂文森走到我这边来，对我说，《华盛顿邮报》的艾尔·弗兰德利和《纽约时报》的斯科特·赖斯顿两个人已听到有关导弹危机的情况。“他们还不知道详细情况，”艾德莱说，“不过，他们已经摸清了事情真相。也许你该给总统打个电话。”

我在吉姆·罗的卧室里打电话给白宫。

“我猜想在舞会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了，”总统说。“这个白宫就象一个筛子。”

“筛子？”我说。“你已经干得非常出色了，使这样一桩事情，在过去五天里，没有出现在报上。现在，你最好还是找个人打电话给《邮报》和《时报》，要他们继续把这个消息保持到星期一晚间后再发表。”

“找个人打电话给《邮报》和《时报》？”总统说。“你在开玩笑吗？我要亲自打电话给它们，现在就打。”

他给报馆打了电话，两家报馆都同意为了国家安全着想，在总统把调查结果和他的要求向赫鲁晓夫摊开之前，决不提到任何有关发现导弹的消息。星期日上午，肯尼迪到圣斯蒂芬教堂做了弥撒后，给空军将领们最后一次机会，让他们就要否直接轰炸导弹基地的问题再辩论一次。在战术空军司令沃尔特·斯威尼将军承认了一次轰炸不可能拔除全部导弹基地之后，他再次排除了空中打击的做法。总统说，要么统统搞掉，要么什么也别干，因为我们没法知道，哪些基地（如果有的话）可以使用，哪些还不能使用。我们也可能没有发现，或者忽略了几个已能使用的并立即可对美国发射的基地。

与此同时，拉里·奥布赖恩和皮埃尔·塞林格正在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国会领袖找拢来，并把他们带回华盛顿，使得总统可以在星期一广播宣布之前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一下他的计划。

由于各地都在展开竞选运动，国会处于休会期间，因此，要找到有些领袖很困难。黑尔·博格斯正在墨西哥湾钓鱼。一架空军直升飞机在他的船上找到了他，把他带到了新奥尔良，由那里的一架空军喷气机把他带到了华盛顿。当参议员和众议员都集合在总统办公室听取总统介绍情况时，肯尼迪对埃弗里特·德克森含笑地说：“唔，今晚你要再度当选啦。”德克森哈哈大笑，说道：“你在芝加哥支持锡德·耶茨的那篇演说很漂亮。可是，太糟糕的是使你得了感冒。”正在加利福尼亚为重新选进参议院而进行竞选的汤·库切尔，看来更有兴趣于同总统一起拍一次照，好向选民显示他正在解决导弹的危机，而不大有兴趣看导弹基地的照片。

会议开得并不愉快。在麦康拿出照片证据并加以解释之后，在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扼要叙述了采取封锁计划的理由之后，军事委员会的民主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大声指责总统的行动方针太软弱并且太不认真。拉塞尔提出要对古巴发动军事进攻。大使总统吃惊的是：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发言的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竟支持拉塞尔提出的入侵建议。富布赖特在一九六一年是政府中响亮地说出反对猪湾入侵的仅有的一位高级官员。现在他却支持军事入侵古巴，似乎完全与他的性格不相称。富布赖特好象是受到拉塞尔不同意总统的计划而迸发出来的怒火的影响，这才一时冲动而讲了这样的话。我坐在那里，一面有点惊异地注视着他，一面简直觉得他一说出那些话，就有些后悔了。总统问富布赖特，“你主张入侵古巴，比尔？你和拉塞尔参议员都这样主张吗？”富布赖特在回答“是的”之前，双脚在地上移来移去，辗转不安地坐在椅子上。

总统生气地打断了拉塞尔和富布赖特的讲话，对他们说，“上星期二我自己也主张过空中打击，或者入侵。但是，再经过

四天的仔细考虑之后，我们断定那并非是最明智的第一着棋，而如果你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对它想一想的话，你们也会作出同样的判断。”他指出，军事袭击可能是第二步的做法，因为武装部队还没有作好入侵的准备。德克森参议员支持总统的计划。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查利·哈勒克虽然同德克森一起支持总统的计划，却没有改善总统当时的情绪，因为那时哈勒克要求在记录上注明肯尼迪虽曾把封锁计划通知国会各领袖，但未就此项问题征求过他们的意见，所以当议员会后陆续走出总统办公室时，总统还是没法压下自己的怒火。

“啊，当然喽，总统先生，我们支持你，”肯尼迪一当议员离开而房门关上时，就对我们说。“可是，那是你的决定，不是我们的决定，如果出了岔子，我们就要砸烂你的脑袋。”

一小时后，当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旁，等着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说的信号时，他抬起头来，看见他那慈母般的私人秘书伊夫琳·林肯手里拿着发刷正向他走过来。他不耐烦地挥手叫她走开，凝神倾听广播员的声音说：“先生们、女士们，美国总统，”而当他的形象一出现在全国千百万架电视机屏幕上时，他就开始说话了：

“晚安，公民同胞们：本政府按照规定，一直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设施进行最严密的监视。过去一周来，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那个被禁锢的岛上目前正在准备设置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基地。设立这种基地的目的只能是配备向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总统接下去便提出撤除或消灭那些导弹的要求，他列举了即将采取的几项步骤。开始以海军对古巴进行封锁，即他称之为“隔离”的措施。任何驶往古巴并载有进攻性武器或导弹引爆装置的船只，都将迫使其停航和迫令返航。他小心地补充说，对

驶往古巴的装有生活必需品的船只，将不象苏联在一九四八年封锁柏林时试图做的那样加以阻止。他说，他也将加强关塔那摩的海军基地，呼吁美洲国家组织采取行动，要求联合国迫令拆毁和撤除那些武器，同时要求赫鲁晓夫停止“这种对世界和平所进行的暗中的、轻率的挑衅性威胁”。

“我国的政策将是，”肯尼迪总统说，“把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都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他又说，俄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对我们向其承担了义务的各国人民，“特别是对西柏林的英勇的人民”的安全与自由所采取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回击。

总统广播之前，已把他的演说的一个副本由我们新任驻莫斯科大使福伊·科勒送到了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的办公室。科勒除了带有总统要求撤除导弹的文件，还带了一封肯尼迪给赫鲁晓夫的私函，这封信触及了他们双方的问题的实质——苏联不相信美国会起来与共产党对它的安全的威胁作斗争。“使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总统在致赫鲁晓夫的信中写道，“你的政府可能会不能正确理解美国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的意志和决心。因为我并没有认为你或者任何其他神志清醒的人会在这个核时代故意要使这个世界陷入战争，而非常清楚的是这种战争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取胜的，其结果只会给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天早晨，总统面带笑容跨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多少认为赫鲁晓夫会以关闭通往西柏林的通道或者轰炸我们在土耳其的雷神导弹等方式，来对他撤除导弹的要求立即作出反应。然而，星期二却是一个晴朗无云的日子，赫鲁晓夫那里一点动静也没有，而美洲阵营却传来了好消息——美洲国家组织的各拉丁美洲国家都支持我们在封锁中使用武力，封锁已定于星期三上午

十时生效。

由于封锁得到了美洲国家组织各国法律上的批准，我们在星期二晚上开会，决定海军应如何阻拦试图通过封锁障碍物的苏联船只。一致认为，任何拒绝停航和不接受搜查的船只，都得以炮击。但是，总统竭力希望避免把船击沉和伤害生命。麦克纳马拉建议用击毁船只的推进器和舵叶的办法，使其失去活动能力，然后把它拖到查尔斯顿和杰克逊维尔港去。肯尼迪总统说：“在你射击船只并把它拖到佛罗里达后，却发现除了小孩的食品之外别无他物的时候，将怎么办？”

海军方面报告说，至少有二十五艘各式各样的苏联船只和几艘可能装备有核导弹的潜水艇正在驶往古巴。我们心情忧郁地一致认为，明天封锁一生效，很可能就得开火。

那天深夜，白宫收到了赫鲁晓夫对肯尼迪总统宣布封锁而发出的第一次愤怒的答复。这个苏联领导人断然地警告肯尼迪：他不打算听从封锁，已经指令驶往古巴的俄国船只的船长不必服从美国海军的停航命令；对任何苏联船只的干预行动都将迫使他“采取我们认为对保护我们的权利所必要的和适当的措施”。星期三上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等待海军关于封锁于十时生效和半小时后第一批苏联船只接近封锁线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的消息时，总统和执委会小组成员则在研究并讨论赫鲁晓夫的那个警告。

从赫鲁晓夫那种坚定而明确的威胁语气中，我们所有在会议室里的人都认为，苏联船只将拒绝停航，而我们的海军舰只和停泊在封锁线附近的“埃塞克斯”号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将被迫开火，接下来，俄国人将以古巴的导弹，或从东欧用洲际远程导弹作为回答，也许还会用占领西柏林来作为回答。从星期日以来，我们在北极星潜艇上的核导弹和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英国基地

的雷神导弹都对准了苏联，作好了戒备；战略空军司令部的B-52轰炸机已满载原子武器进入空中；海军有一百八十艘舰只部署在加勒比海地区；陆军第一装甲师及其他一些战斗部队已从得克萨斯开到佐治亚和佛罗里达，准备入侵古巴。假如在封锁线上一开始射击，就可能马上爆发一场核大战。我们都等在白宫会议室里，我们觉得，一切都取决于赫鲁晓夫在下两个小时内的所作所为。

十时过后几分钟，封锁生效时，海军向麦克纳马拉报告说，在距封锁线不出几哩之内，有两艘俄国船正在通往古巴的航道上很快地前进。接着，又来了一个报告说，有一艘苏联潜艇正在为那两艘船护航。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总统问道。

麦克纳马拉解释说，只消派出一艘驱逐舰就可以迫使那两条船停航。可是，现在由于出现了潜艇，使得驱逐舰靠拢时将有风险。不过“埃塞克斯”号可以向那艘潜艇发出信号，命令它浮出水面，以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那艘潜艇拒不浮到水面上来并停航的话，那么，“埃塞克斯”号上一架直升飞机就可以向它扔下一颗小炸弹。我瞧着总统。他似乎很镇静，但是，他正在把右手张开，接着又捏拢来，紧紧握成一个拳头。几分钟后，他说道：“难道我们第一艘要使其停航的船只，一定要是一艘潜艇吗？我们不能挑别的什么船吗？”

麦克纳马拉说，不能忽视那艘潜艇。

我们又重新在等待并捉摸事态的发展，这时，一个信使走进了会议室，交给约翰·麦康一张条子。麦康匆匆地念了那张条子后，说道，“总统先生，我们得到了一个初步报告，表明有些俄国船只正在停止航行了。”接着，这个初步报告得到了证实，一个海军情报官员带着一份完整的报告来到了会议室。那份报告说，

有二十艘俄国船只，在到达封锁线前，已经停了下来。其中有些船停在海里一动不动，而另外一些船已掉头开回欧洲去了。

这时坐在总统身旁的迪安·腊斯克悄悄地说：“我们是在眼球对着眼球，而我认为对面那个家伙刚眨了一下。”

腊斯克并不是以富于机智著称的，但是，他居然说出这句十分巧妙的话来，着实令人惊异，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我们所有的人突然感到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当时感到，总统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即在第一批俄国船只和潜艇于那个历史性的星期三上午从封锁线掉头离去时，我们已经到达了并且已顺利地通过了古巴导弹危机的真正高潮。肯尼迪在大西洋上划了一条线，向赫鲁晓夫挑战，看他敢不敢逾越它。赫鲁晓夫看到这一挑战，转身就跑了。从此以后，情况就急转直下了。

封锁区的紧张局势又持续了三天。星期四，肯尼迪总统允许苏联油船“布加勒斯特”号通过封锁线，在船长向海军保证他只装载石油，而没有装载武器或军用物资之后，该船没有受到登船搜查。

与此同时，艾德莱·史蒂文森在安理会一次关于导弹的辩论中，给了苏联驻联合国大使佐林一顿臭骂。佐林力图否认摆在安理会会议桌上的导弹基地的照片证据，史蒂文森则以一种法庭审案的盘问方式来挫败佐林。

“我现在不是在一个美国法庭上，”当时佐林对史蒂文森说，“因此，我不想回答一个象是检察官提问那样地对我提出的问题。”史蒂文森说：“可你现在正好是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可以回答承认或者不承认。”史蒂文森后来对我们说，第二年夏天，他在莫斯科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碰到赫鲁晓夫时，这位苏联总理向他咆哮说：“史蒂文森，我们可不喜欢象在被告席上的犯人那样被人审讯。”

星期五，我们接待了一个来自外交渠道以外的、带来了俄国的解决办法的试探者。华盛顿苏联大使馆的一个成员亚历山大·福明，此人一般被认为是苏联大使馆负责情报的头头，他找了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采访国务院消息的记者约翰·斯卡利，要斯卡利向腊斯克试探一下是否可能以答应撤除导弹并保证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保证。斯卡利把这个建议带给了腊斯克，腊斯克把他带到了白宫。正当斯卡利和腊斯克等在我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候机会见总统时，皮埃尔·塞林格意外地碰上了他们，皮埃尔以为斯卡利想背着他并在我的默许之下，单独谒见总统。

“你到底要呆在这儿干什么？”皮埃尔对斯卡利大声叫嚷道。

我从办公室里跑出来，想平息这场风波，这时腊斯克对塞林格说，“没什么，没什么，皮埃尔，是我带他来的。”

我把斯卡利和腊斯克领进了总统的办公室，在那里，总统听取了福明的建议，并指示斯卡利回去答复他，作为一项解决办法的基础，它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不要用我的名义，”肯尼迪补了一句。“这是违反常规的。只让他们有这么一个印象，你跟我谈过了，但是不要明说。告诉他们，你已经从政府最高当局得到了很好的反应。”

星期五那天晚上，总统收到了赫鲁晓夫的一封冗长的私函，内容包括了福明向斯卡利提出的同样的建议——撤除导弹和答应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古巴来换取美国不入侵该岛的保证。自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维也纳会晤以来，他们一直在官方渠道之外保持非正式的和公开的信件往来。赫鲁晓夫显然是亲自写这封信的，大概没有同克里姆林宫任何人商量过，他还想象他以前给肯尼迪的个人信件一样，使这封信作为吐露他的感情的、个人之间的信件，而不作为官方函件。这封信从未在苏联公

开过，而且，出于对赫鲁晓夫的尊重，肯尼迪也不许把它在美国发表，虽然在总统去世后，美国报刊上曾出现过某些片段的摘录和意译。星期五那天晚上，当总统把那封信读了第一遍——后来又读了好几遍——之后给我看时，我大为赫鲁晓夫的极度忧虑所感动，他深怕激起肯尼迪的好战情绪和战争准备。他要求肯尼迪不要失去“自制”，恳求他让“我们俩不要拉紧那条你们已经打上了战争结头的绳子的两头，因为，我们俩拉得更紧，那个结子就结得更死了。……我们不仅要放松拉住绳子两头的力量，而且我们还要采取措施来解开这个结子。我们是准备这样做的。”

星期五那天晚上，总统和我们所有看过赫鲁晓夫这封信的人，——那封信写得很长，只得由电传打字电报机分四部分录下来——整个星期来，第一次轻松地睡了一次好觉。

星期六上午，当总统和执委会小组为了给赫鲁晓夫请求解决问题的来信起草一封同意的复函而开会时，莫斯科电台宣布了赫鲁晓夫致肯尼迪的另一封信的文本。这封信的语气和内容都与总统星期五晚上接到的那封私人的、不公开的信件完全不同。这第二封信语气严厉并有所要求，它还提高了勒索的要价，坚持只有美国同意从土耳其撤走它的雷神导弹，苏联人才会从古巴撤除他们的导弹。当然，这种要求无异是一次敲诈勒索，而不是赫鲁晓夫在其第一封信中所提出的那种相互作出和平保证的合理的往来。

第二封信是那么不同于第一封信，这就不免引起了一些使人惊恐的问题。难道一夜之间赫鲁晓夫已被那些认为他甘愿同肯尼迪合作而恼了火的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军国主义者推翻了吗？难道我们现在正在同俄国另外一些领导人打交道了吗？新近从驻莫斯科大使任上回来的卢埃林·汤普森却持比较稳健

的、正确的看法，认为赫鲁晓夫的顾问们已经使他确信，他让肯尼迪占了太多的便宜，已经劝服他不妨试一试用我们的雷神导弹来作一次交易。更糟的是，我们接到了一份报告，说当初拍摄导弹发射基地照片的 U-2 飞机驾驶员之一、小鲁道夫·安德森少校在从事一次同样的侦察飞行中，在古巴上空被击落了。安德森少校的飞机显然是被苏联的一枚地对空导弹击中的，这就是说，在古巴的那些防御性武器目前已可以使用了，这就使得进行一次空中打击也有危险了。

总统对于局势这样突然转变，不禁大为恼火。

当天下午，执委会便定下心来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考虑如何回答赫鲁晓夫最近提出的要求。国务院已经起草了一份复函，拒绝从土耳其撤除导弹。但总统对那封信稿并不感到满意。博比建议，不理睬赫鲁晓夫的第二封信及其关于导弹交易的要求，而是直接回复总统星期五晚上接到的赫鲁晓夫的第一封私函。总统立即同意那个主意，并要博比和特德·索伦森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写回信。

不到一小时，博比带着一份手写信稿回来了。它接受了赫鲁晓夫星期五的建议：以从古巴撤除苏联导弹和不再把进攻性武器运进该岛换取撤销封锁和美国部队将来不入侵古巴的保证。这封信没有提到在土耳其的雷神导弹。总统对这封信的原文进行了加工，改动了一些词句，然后交下去打好字，签了名。他要在这封信传送到莫斯科的同时向新闻界发表该信，并要博比带一份副本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去给多勃雷宁大使。

“对他说，如果我们到星期一没有得到回信，”总统说，“我们就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了。”

他要执委会在当天晚上九时再开会。

当天晚上的会议，情绪很悲观，这是总统在职期间，我们在

白宫所度过的最令人沮丧的时刻。我们都认为，要在第二天收到赫鲁晓夫的任何答复，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尝试。总统要麦克纳马拉在第二天早晨安排一次与斯威尼将军的会议，以讨论空中打击的计划；他还签署了一道命令，要空军后备队的二十四架运输机中队进入现役，以应付入侵古巴之需。

第二天早晨，在去做礼拜日弥撒以前，总统就听到了首先在莫斯科电台报道的一件大新闻：赫鲁晓夫已对肯尼迪星期六的信件发出复信，同意从古巴撤除苏联导弹，并表示愿意接受“为消除目前冲突而提出的一切条件”。总统到教堂去的时候，他对戴夫说，“我觉得象是一个新人那样。你知道我们已经安排好，要在星期二进行空中打击了吗？感谢上帝，这全过去了。”

肯尼迪总统作弥撒回来后出席了执委会小组一次会议，讨论局势变化后应采取的步骤时，他使我们看到了他的伟大之处，有人激动地建议，他应该到电视上去宣布已经战胜了苏联侵略者。“决不能那样做，”他严峻地说，“我不希望本政府有任何人显得自鸣得意和说出一句幸灾乐祸的话来。”他还说，我们已经由于允许赫鲁晓夫从危机中缩回去，没有使他彻底丢脸，而避免了一场大战；我们必须小心，不要再让他丢脸。总统后来只是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赞扬赫鲁晓夫停止在古巴构筑基地并同意拆除进攻性武器“是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是“对和平作出了重要而积极的贡献”。

在赫鲁晓夫那封投降信的文本到达白宫时，我们看到信里有几句话委婉地抱怨我们的 U-2 飞机星期六在北极附近作空气取样飞行的归途中在苏联领空迷航一事。赫鲁晓夫称那架飞机可能被误认为是一架轰炸机。在我们看信时，我对总统说，“我敢打赌，当他们在雷达上发现那架 U-2 飞机时，一定认为那是我们战略空军的一架核轰炸机。它使赫鲁晓夫吓得灵魂出窍，

也许就是这一点使他立即要求你谋求解决的办法了。”

“你可能说对了，”总统说。“但是，如果你以为我会给那架U-2飞机的驾驶员颁发一枚奖章，奖励他在苏联领空上迷航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写给赫鲁晓夫的回信中，总统解释说，那架飞机飞行时并未携带武器或照相设备，它是在寻找核放射尘样品时发生了误航，因此，将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防止再度发生类似事件。

几个星期以后，他亲自设计并向蒂法尼珠宝商店定制三十四只一九六二年十月份的银制小月历牌，以胡桃木为底衬，把古巴导弹危机那十三天做得比月历牌上其余各天更为凸出。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他私下把这些纪念品送给了执委会的成员及其班子的其他成员，和在那段期间内曾对他有所帮助的一些普通公民。

（摘译自美国肯尼思·奥唐奈、戴维·鲍尔斯和乔·麦卡锡合著：《约翰尼，我们不太了解你：回忆约翰·肯尼迪》一书，一九七四年纽约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美室译）

信件的经历

〔东德〕《新德意志报》

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写信给正在不伦瑞克的威廉·白拉克，信中附有《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一文，请他将批评意见“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

五月十日：白拉克写信告诉马克思，他收到和阅读了信件，并将信件寄给了在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估计盖布和奥艾尔也会到那里去的。

五月十二日：威廉·李卜克内西——马克思所批评的纲领草案的作者，在莱比锡同盖布、奥艾尔会面。

五月二十六日：哥达合并代表大会期间（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李卜克内西在一封信中请威廉·白拉克：“写信告诉伦敦人吧！我们做了某些修改……纲领一致通过了。”

七月七日：白拉克将马克思的原信寄回伦敦，此件已在六月二十八日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卡尔·马克思在伦敦逝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接收了他的遗物。

一八九一年一月六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将马克思对纲领意见的手稿用挂号信从伦敦寄到斯图加特，让卡尔·考茨基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

一月二十一日：奥古斯特·倍倍尔告诉恩格斯，没有人给

他看过马克思的一八七五年的信件。

二月一日和三日：马克思对纲领的批判（语气被稍微改得缓和一些）以“批判社会民主党纲领”为题，第一次在《新时代》杂志上发表以后，威廉·李卜克内西也在《前进》报上刊印。

十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在爱尔福特举行。在那里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同哥达纲领相比，前进了一大步。

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逝世。从他的遗物中，爱琳娜·马克思接收了她父亲的手稿，估计也有一八七五年信件的原文。

一八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爱琳娜·马克思死后，她在伦敦附近西登汉住宅里保存的文物，转到住在巴黎附近德拉维依的她的姐姐劳拉·拉法格那里。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死后，住在巴黎的燕妮·龙格和沙尔·龙格的后代接收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文物。

一九六〇年：马赛尔·沙尔·龙格——马克思的外重孙，将一八七五年的原信给了莫斯科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

（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到十一日东德《新德意志报》 边益译）

创价学会的现状

〔日〕杉森康二

创价学会曾有四次引起社会注意的大活动：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间进行了一次“传道”大游行；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间开展政治活动创立了公明党；一九六九至一九七〇年间提出了所谓“言论问题”；一九七五年同日本共产党签订了十年合作协定。

创价学会，现在在日本已经成为谁也不能漠视的巨大的组织。该会会员号称有七百七十五万户，是名副其实的我国最大宗教团体。同时，它通过公明党的支持，不仅对我国的政治施加一定的影响；最近还通过和平运动、教育运动以及文化领域的活动，在我国整个社会中建立了重要的支柱。因此，当前进一步分析研究创价学会就成为比以前更为重要的课题。

现在，是“诸神俱亡”的时代。在欧洲、美国那样有了高度物质文明的社会，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于宗教的关心日益淡薄了，在我国也并不例外。

但是，正在这个时代，创价学会通过宗教的吸引发展成为巨大的组织，其理由何在呢？这是一个从现在到将来的社会生活和宗教问题之间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今天，经济高度成长时期已经过去，盲目追求享受和物质文明应有所克制。在这个情况下，又怎样寻求适宜的生活方式呢？如果这样提出和思考问题，那末，研究创价学会就有更重大的意义。当然，包括创

价学会在内的宗教对于贯串于今天到未来的人类生活方式能否给予“充沛的精神”和“有意义的内容”，不是一个容易得出结论的问题。但是，宗教过去对于人类的精神安定曾起过很大的影响作用，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人们也不能无视它们所起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说，研究创价学会决不是无益的。

学会的教义

创价学会是什么？按照创价学会所属东京大学学生组织“东京大学法华经研究会”一九七五年一月出版的《创价学会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所述是这样的：

“创价学会是信奉日莲大圣人的佛法为绝对真理的佛教信徒所组成的宗教组织。会员通过皈依富士大石寺的主佛自觉进行自身生命的变革，同时持有在现实生活中寻求幸福的具体信仰目的。他们的宗教意识，并不光从个人的立场出发，而是不断摄取广泛地散布于社会的、全人类的观点，展开其远大的抱负和使命，以导致世界和平与繁荣。”

照此看来，创价学会首先是绝对信奉日莲圣人教义（佛法）的信徒团体。但实际上，它又同其他日莲各宗派的佛教团体在教义上有很大的差异。

创价学会在教义上的特点在于：约在七百年前的日本佛教信奉者认为：惟有日莲教义（佛法）已经达到了起源于释迦的佛法哲理的顶点，而它又是包容和超越了释迦佛法的最新佛法。创价学会就以此为佛教史上最高教理。同时，创价学会又把释迦死亡后的一千年叫做“正法”时代^①，随后的一千年叫做“像

^① “正法”时代，指释迦死后一千年间佛法盛行时代。

法”时代^①，此后叫做“末法”时代。在“末法”时代，释迦的佛法已失其作用，实际上已经消亡。按照中国的天台大师教义，在“末法”时代会有新佛出现，在这个时代初期（约七百年前）诞生的日莲就是新出现的佛。换言之，释迦所传布的佛教，以最高的经——法华经为中心，而所有日莲教义（佛法）都继承、包容了这个教义。创价学会就是以信奉日莲教义为唯一教理而成立的。然而，其他日莲宗派与此不同，他们虽承认日莲为法华经的修验者，而他们所信仰的是法华经，即释迦的教义，他们所采取的是信奉释迦的立场。

最近，小松左京在他的论文中指出：现在有把佛教作为现代社会思想进行重新评价的必要。从这个观点来看，重新评价工作尽管作得不够，但创价学会试图以释迦的教义来剖析中世纪的日本社会状况，而以已经确立了的独立的佛法体系の日莲思想为基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加以重新整理，使它在现代社会中能发挥机能，从促使佛教现代化这个观点来看，创价学会的这个努力比传统的日本佛教各宗派更能获得人们高度的评价。

创价学会的理论，不光是为了搞宗教活动，更值得注意的是，还以搞和平运动、反对公害运动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活动为其基本任务。按照创价学会的观点来说，战争、核武器的扩展、公害和其它社会性的祸害，终将导致全人类精神的颓废。因此，认为每个人经过基于正确思想的自我改造——人类革命——才能根绝这些社会的邪恶。这种思想改造，换言之，唯有皈依日莲思想，才是清除社会邪恶的动力。因此，创价学会就产生了传布日莲教义是社会各种活动的基础的思想。

关于人的自我改造的思想，也是关系到我国将来的一个问

^① “像法”时代，指释迦死后第二个一千年间佛法尚存在，但对它的信仰日渐流于形式的时代。

题。在我国，随着丰富的物质享受，社会的道德堕落，利己心无止境地发展，日益失去人的本性，只主张权利而漠视义务。这样的社会风气，决不是行政措施或政治力量所能抑制。不，这种抑制的权力愈是出现，则对抗的力量也越是与日俱增，社会也将进一步混乱。按照这个意义来说，作为“镇静”哲学的佛教所能发挥的作用，今后必将加强。

但是，要求佛教发挥作用，首先佛教必须重新产生现代化的思想。换言之，佛教思想的精髓是：把现代社会与每个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用现代社会的语言来表达，把它作为导致解决现代社会各种矛盾的思想方法。但从这一点来说，佛教界所作的若干尝试并不能说是成功的。

当然，同其他佛教团体比较起来，正是创价学会做了最积极的工作，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例如，东京大学法华经研究会的论文以及《法华经》的出版就是这个工作之一。

但是，按照上述的意义来说，这些著作还没有达到佛教思想现代化的目的。因此，今后为了进一步促进这个工作，把佛教思想作为现代人类的共同思想，有必要进行继续努力。

学会组织的特点

学会同其它群众团体和政党组织比较起来具有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学会组织一方面保障会员的自主性，同时还使会员能在多方面发挥其能力，实现他们多样化的要求。学会今天之所以能发展成为拥有七百七十五万户惊人的巨大组织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具有优越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当然，学会今天之所以获得飞跃发展的原因，尚有其他因素。这里且来谈一下关于它的发展主要原因之一的组织结构。

推动创价学会日常活动的组织叫做“集团”。按地区划分为“集团”，作为活动的基层单位。每一“集团”并不一律，一般由十数户会员组成。集若干基层“集团”为“大集团”；集若干“大集团”为“总集团”。以此为基础，组成“综合集团”、“集团本部”、“集团综合本部”。

座谈会每月举行例会一次，主要在基层“集团”单位举行。以钻研教义为目的的“御书学习会”，则集合两至三个“总集团”来共同举行。为了向社会宣传学会理论而进行的讨论会，则在“总集团”单位举行；为了规划、经营教务而举行的协议会则按“集团”、“大集团”、“总集团”层层召开，负责推动活动的领导人也出席参加，广泛交换意见，进行讨论。

作为学会活动体的座谈会，原则上每月一次，在全国各地召开。在会上，会员相互交谈，通过信仰实践，把生活的经验和教训区别为烦恼、痛苦和喜悦。此外，在座谈中也学习日莲的教义，交谈社会问题。可以说，座谈会是密切联系生活、交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场所。

学会又在全国各地的公会堂等处召开有非会员参加的佛教讨论会，联系佛教生活，举办大家都能理解的教义讲述。此外，以青年部为中心的青年部会以及和平运动、社会运动等也以“集团”组织为中心开展活动。

学会组织的特点是：在其基层组织中进行极其活跃的活动。这个组织，与其说有自上而下的领导，不如说，由基层组织自主地展开活动作为会员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基层组织能自主地进行活动，故洋溢着充沛的精力；反之，如果基层组织失其自主性，没有自发性的活动，这个组织必将失去其活力。到现在为止，学会之所以能持久地不失其活力，之所以能维持其正常的发展，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自主性。

学会的会员按性别、年龄、职业和能力以及按活动的方面，分别编入有关的部机构。部机构分壮年、妇女、青年三部；此外又分文化本部和社会本部两个部。据一九七五年十一月的调查，青年部所属会员共有五百零八万人。

学会的领导成员中有会长一人，理事长一人，副理事长一百五十一人，理事一千二百七十三人，总务八十一人。会长有任免理事长、副理事长、总务及其他重要领导人员之权。

学会领导成员的最大特点为青年人居于重要的地位。一九七五年五月举行池田会长就任十五周年纪念时，池田的年龄仅四十六岁。在十名副会长中，除若干名年龄较大者外，其余大多为四十岁左右，平均年龄为四十七岁；担任部长、副部长职务的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在我国的大组织团体中如此选用青年人担任领导成员的除创价学会外是没有的。

学会的机关报为《圣教新闻》，于一九五一年创刊，发行数现为四百二十五万份，为我国屈指可数的最大报刊之一。发行主要对象为会员。又发行以会员为对象的机关月刊《大白莲华》（发行数为二百十二万份）和《圣教俱乐部》（发行数为一百零八万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间，又组织了股份公司，设立以会员和社会为对象的“潮出版社”，出版独特的综合杂志《潮》，接受非会员的学者、记者、作家的作品，刊载引人注目的专辑和论文，借以与会外的学者和学会紧密结合，取得良好的效果。

国 际 活 动

在前年至去年这一时期中，池田会长的国际活动十分活跃。当然，以前也曾进行过出国访问，今后同外国知识界人士的会谈将更加频繁。过去两年间的国际活动比以前的访问规模更大，

在政治方面的作用更为重要。例如，前年曾第二次访问中国，初次访问苏联，去年一月访问了美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访问，接连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中国总理周恩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进行了会谈。这些会谈内容都通过报刊有所报道，池田会长自己也在报刊上撰文或发行单行本。实现这些会谈，当然是由于创价学会和池田会长在国内的地位以及池田会长的言论得到国际评价的结果。到现在为止，日本人能够会晤中苏领导人的除首相、外务大臣、政府代表以及少数财界首脑以外，只有池田会长。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创价学会的存在的重要性是可以想见的。同时，这也是创价学会的海外活动能够得到国际重视的例证。

最近数年来，池田会长同外国人进行会谈的并不以上述政治家为限。他所会谈的重点放在文化和教育的交流方面。在美国、苏联、中国、法国等国历访了各该国的大学，签订了交换图书和交流教授的协议，其中若干项目已付诸实施。池田会长积极地进行国际交流活动自有创价学会的理想为其背景，那就是要把日莲正宗发展成为世界宗教，促使佛教精神国际化，以建立永久的世界和平。

创价学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建立国际佛教联盟。这个国际组织由散布于七十四个国家的四十万会员和日本一千万会员所组成。设立这个联盟组织是为了使创价学会成为世界宗教跨出第一步。现在日本以外的四十万会员中，百分之七十五集中于北美和南美；东南亚、欧洲、中近东、非洲的会员为数不多。在我国诞生的宗教，突破侨居国外的日本人的范围，而以外国人为对象进行传教，在初步阶段就能取得一定成效的例子，除创价学会外是没有的。创价学会以相当快的速度扩大其组织是值得注意的。一九六〇年开始向国外十七个国家进行活动时仅有会员七

百十人，至一九七五年，开展活动的国家有八十二个，拥有会员达四十一万人。在美国、墨西哥、巴西、泰国、印尼、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十九个国家，该会已被许可作为各该国的宗教法人团体。这样，过去日本的宗教团体仅以侨居外国的日本人为传教对象，而现在创价学会却以外国人为传教和组织对象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在美国的会员中，美国人约占百分之八十。

现在，创价学会在国外以日莲正宗的名义进行活动。其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公明党自从一九六四年成立以来，同创价学会密切的政治联系，在国外进行传教活动恐被误解为政治活动。为防止这个误解，才不用创价学会的名义。在美国，现用日莲正宗学会名义，在德国用德国日莲正宗名义继续进行活动。

今后，学会将日渐着力于对国外的传教，尤其是池田会长将成为国际创价学会的会长，从国际观点和立场来说，必将努力于使日莲正宗成为世界宗教。当然，日莲正宗的世界宗教化不是轻而易举所能达成的，但也决不是不可能。为了争取成功，必先实现佛教理论现代化，并有必要确立一个同每个国家社会及其自然风土相结合的组织理论。

（摘译自一九七六年三月日本《自由》杂志 史惠
康译）

中国人在美国

威廉·L·董

编者按：作者是华裔美国人，纽约大学皇后学院国际法教授。这本书的不少观点是错误的，但提供了一些旅美中国人在美国创业时期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及受到美国资产阶级剥削、奴役和排挤等情况。这里摘译的是其中一部分。

要查明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确实年份是有困难的。有些历史学家指出，早在一五七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就出现了一批中国造船工人；一七八八年在美国最西部有中国劳工；一八〇七年有一个中国人在纽约居住。有些非官方的资料指出，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之前，中国人已在北美和西半球其它地区出现了。然而，在美国移民当局的正式记录中，一八二〇年是作为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年份。

中国人在美国的情况与它的移民历史密切相连，可划分四个时期：

自由移民时期（一八二〇到一八八二年），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铁路建设，十分需要中国劳工。

歧视限制时期（一八八二到一九〇四年），从一八八二年五月二日第一个排华条例的通过，到一九〇四年全面排华法令的颁布。

全面排华时期(一九〇四到一九四三年)，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七日颁布的法令，无限期扩大到业已实施的所有排华条例，并适用于美国所有岛屿殖民地，直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所有排华条例的废除。

逐渐放宽时期(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废除所有排华条例之后，国会制定了若干新条例，特别是一九六五年的移民与归化条例。

自由移民时期(一八二〇到一八八二年)

- 一八二〇年 据移民委员会报告，第一个中国人来到美国。
- 一八二一到一八四〇年 据移民委员会记录，这二十年中只有十多个中国人到达美国。
- 一八四四年 七月三日，中国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从而两国建立正式关系。根据条约，美国片面地获得了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
- 一八四七年 第一批中国学生三名到美国求学。他们是：容闳、黄胜和黄宽。容闳后来成为一个著名学者和教育家，也是第一个通过归化取得美国公民权的中国人。
- 一八四八年 旧金山发现了金矿，中国劳工三名(两男一女)到达加利福尼亚。男的做了矿工，女的在由香港回美的传教士家当佣工。
- 一八四九年 到达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劳工人数达五十四人。首批来美求学的中国学生容闳考入耶鲁大学。
- 一八五〇年 这一年，在加利福尼亚的中国人总共有四千名。很多中国人从广东省到香港和澳门，经苦力贩子订契约把他们装运到美国西海岸及其它国家，特别

是古巴和秘鲁。

- 一八五一年 加利福尼亚中国人迅速增加，一年内由四千增至二万五千人。
- 一八五二年 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对外国劳工每人征新税三美元。另一条法令规定船主应为每个乘客交纳五到十美元税款。这一年，中国人来到旧金山有两万多人，在所付该项新税总额中占百分之四十五。在夏威夷，夏威夷皇家农业社组织进口二百八十名中国劳工。
- 一八五四年 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裁决，按州法律禁止有色人种出庭作证反对白种公民。
四月，旧金山《金山新闻》(周刊)创刊，这是加利福尼亚出版的第一张中文报纸。
- 一八五五年 一月四日，另一张中文报纸旧金山《东洋新闻》出版。
- 一八五七年 据《哈泼斯周刊》记载，虽有种族偏见，这一年有两个中国男人和爱尔兰族及日耳曼族女人通婚。
- 一八五八年 四月二十六日，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通过一项法案，进一步限制中国人或蒙古族人移民该州。
六月十八日，在缔结中美《天津条约》的交涉过程中，美国代表向中国直隶总督谭廷襄提出非正式建议，希望中国政府派遣领事馆的官员驻美国。中国总督认为，中国移民未经批准擅离祖国，没有加以保护的理理由。
- 一八五九年 清廷与西方列强包括与美国签订《天津条约》之后一年，改变了传统的政策，允许中国臣民出国永久居住。

- 一八六〇年 据人口调查，这一年在美中国人总共有三万四千九百三十三人。
按加利福尼亚州法令，禁止蒙古族人、印第安人和黑人入公立学校。
- 一八六一年 这一年，又有不少中国人到加利福尼亚。据旧金山海关记录，新到达的有八千四百三十四人，回国的有三千五百九十四人。
- 一八六三年 加利福尼亚立法机构制定一项法律，凡印第安人或有一半印第安人血统的人，蒙古族人以及中国人，不准为任何白种人出庭作证。
参加太平洋中央铁路建设的大批白种工人，因经不住艰苦而纷纷离职，四大股东之一的卡利斯·克劳克尔主张招募中国劳工，并顺利实现。
- 一八六四年 太平洋中央铁路建设中的中国劳工有四千人，成为一股重要的劳动力量，而白种工人只有一千人。
- 一八六五年 中国劳工在太平洋中央铁路建设中作出了良好的成绩。公司当局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和中国广东省继续招募，高峰时期多达一万人。
- 一八六八年 七月，中美两国政府于一八五八年六月缔结的中美条约的补充条款，又名《蒲安臣条约》，在首都华盛顿签字。代表美国签字的为国务卿西华德，清廷代表为蒲安臣。按该项补充条款，两国公民有权在各该国侨居和移民，但归化问题除外。两国还保证给予两国公民有居住、入学以及在最惠国的基础上享有旅游等互惠权。
西海岸四万名中国矿工被白种工人驱逐出矿区。这些矿工被迫转入农场做工，有的在家庭做佣工。

- 一八六九年 横贯大陆铁路的完工，是十九世纪最重要建设成就的标志。这条太平洋中央铁路在建设高潮时，中国劳工占到百分之九十，约九千人。
十一月，一八六八年中美《蒲安臣条约》在北京批准。
- 一八七〇年 随着横贯大陆铁路建设的完成，中国人加速向东部转移，一小部分转入南方。这一年冬天，约六百名中国劳工参加亚拉巴马和卡打奴加铁路建设，二百五十名参加休斯敦和得克萨斯铁路建设。在农场的中国劳工也相应增加。
这一年，在美中国人总数为六万四千一百九十九人，大多数居住在西部。
- 一八七一年 新奥尔良和旧金山的一家中国商行丰乐公司，刊登广告从中国招募一千五百名劳工来美，月给工资二十二美元。
在洛杉矶，中国劳工惨遭大屠杀。
- 一八七二年 七月，在最早的中国留美学生容闳带领下，由清朝政府派遣的三十名青少年，年龄十到十五岁，来到美国求学。之后陆续有三批人数相等的青年来美就读。
加利福尼亚州禁止中国人拥有地产和领取营业执照。
- 一八七四年 旧金山参加工会的白种制烟工人，要求老板只出售他们制造的卷烟，不买卖中国人制的卷烟。
- 一八七五年 排华运动从加利福尼亚开始，逐渐扩展到各州，特别是俄勒冈和华盛顿两州。
为增进友好和保护侨民，清廷终于任命陈兰彬和

容闳为帝国使节，派驻美国、秘鲁和西班牙。

一八七六年 在加利福尼亚中小城镇的很多中国人被逐出，其中有些人横遭残暴殴打。

排华运动，其影响所及远远超越加利福尼亚州范围。这年的总统选举，两党都对华移民问题作出妥协、让步。

一八七八年 九月二十八日，清廷在两年前任命的使节陈兰彬和容闳，向美国政府递呈证书。

一八七九年 国会通过一项排华法令，禁止中国劳工继续移民。这一法令因与一八六八年中美条约相抵触，被海斯总统否决。

一八八〇年 十一月，在美国政府要求下，经修改的中美条约签字。修改的新条款是，清廷同意合理地限制、暂停但不绝对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美国政府则同意采取措施保护已在美国的中国人，并按最惠国待遇给予中国人以其它国家国民享有的同等的权利。

一八八一年 国会不顾一八八〇年修订的中美条约，制定停止中国移民二十年的法案，亚瑟总统认为该法案不合理，终于否决。

清朝政府对美国采取歧视中国人的立法以及不准中国学生进军事院校表示不满，清廷下令由政府保送的留美学生回国。

歧视限制时期(一八八二到一九〇四年)

一八八二年 五月，加利福尼亚白种工人，对国会施加强大压

力,要求采纳排斥中国劳工的立法,规定熟练和非熟练的中国劳工十年内不得进入美国;已在美国居住的中国人无权申请入美国籍。

- 一八八三年 一八八二年的排华法主要针对中国劳工,其它职业的中国人仍能继续来美,这年来美的中国人计有八千零三十一人,但以后就急剧下降。
- 一八八四年 七月,国会通过了对一八八二年排华法的修正法案,进一步限制中国人重来美国。
- 一八八五年 随着全国处于严重萧条状态,排华运动也到达疯狂暴行阶段。在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城,三十个中国人被白人杀害,太平洋沿岸六十四个劳工组织临时集会,共同商讨反华措施。
- 一八八六年 华盛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等西部各州许多城镇的白种工人,采取各种手段驱逐中国人;在阿拉斯加的道格拉斯岛上,一百个中国人被迫登上小船,漂流在海上。
- 一八八七年 据人口调查局统计,这一年只有十个中国人来到美国。
- 一八八八年 国会通过一项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排华法案的补充条款,禁止中国人再次来美,即使是暂时离开美国的也不例外。因此有二万多名中国劳工离美回国后丧失再来美国的权利,其中有六百人在回到美国时被拒绝入境。
- 一八九〇年 据人口调查报告,这一年中国人在美人数为十七千四百八十八人。
- 一八九一年 亨利·W·布莱尔被任命为美国驻北京使节时,清廷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他任参议员时赞

成通过一八八八年排华法。

旧金山《中国人世界报》创刊。这是在美国的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张中、英文对照的日报。

一八九二年 五月，国会通过一法案，把一八八二年排华法延长十年。

一八九四年 三月，中美两国就十年内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达成协议。

孙中山在火奴鲁鲁成立第一个中国革命团体兴中会。

一八九五年 四月，在美的中国人得悉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被日本击败，并签订空前屈辱的《马关条约》，大为震惊，许多中国人转而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一八九六年 清廷大臣李鸿章从俄回国途中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的款待。据说中国的“炒杂碎”一菜就在此时风行全美。

一八九七年 来美中国人数有三千三百六十三人。这是从一八八三年以来最多的一年。

一八九九年 美国宣布对华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一九〇〇年 四月，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居住在夏威夷属地的中国人需要申请居留证。

中国人在火奴鲁鲁出版中文《新中国新闻报》。

一九〇二年 三月，在卡本特尔将军的捐赠下，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丁龙”中文讲座的基金。

第一个中国女学生到美国求学。

一九〇三年 一个美国使者去中国邀请中国商人参加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同时，美国财政部对中国的展出提出了歧视性条件。

全面排华时期(一九〇四到一九四三年)

一九〇四年 四月，在一八九四年中美条约限制中国劳工移民十年期满之后，国会通过另一立法，无限期延长所有现存的排华法案，并适用于美国所属的所有岛屿。

九月，菲律宾政府发布第三十八号行政命令，有关对待中国人的美国条例扩大到菲律宾。

一九〇五年 为抗议美国排华法案及在美中国人遭受的迫害，全中国开始爆发了抵制美货运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公开承认说，“我们不能期望中国公正地对待我们”，因为“导致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无疑是由于我们对待中国人移民的态度。”

孙中山在东京建立革命团体同盟会，旨在驱除鞑虏，创立民国。许多海外及在美中国人参加并捐献基金支持这一活动。

一九〇六年 许多白种工人认为，一八八二年排华法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已在美国的中国劳工有十万之多。美国“产联”头子塞缪尔·龚帕斯竟提出“种族纯洁”的号召。

旧金山大火，旧唐人街被毁。

一九〇八年 反华小册子《排斥中国人的几点理由》再版发行。

一九〇九年 三月，清政府颁布第一个国籍法，对国籍的获得和丧失作了规定，准许中国臣民自愿放弃中国籍。在这以前，是以中国臣民忠于清廷不可改变的原则为基础，对擅自背叛者判以重刑。

- 一九一〇年 十年来，中国人在美人数量继续下降。据本年人口调查报告，只有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一人。
旧金山另一张中文报《年轻的中国》创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 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十一月十八日，重行制定原清政府在一九〇九年颁布的国籍法。
- 一九一四年 十二月，中国公布修改后的国籍法，对自愿放弃国籍的条款无更动。
- 一九一五年 移民与归化局编制的被驱逐出境者统计资料，其中被逐出的中国人大多是证件不完备和超过居留期限。
- 一九一六年 中国华昌公司在美建立。到一九五三年，该公司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家炼钨企业。
- 一九二〇年 十年来，在美中国人总数继续下降，从十年前的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一人减少到六万一千六百三十九人。同时，女性从四千六百七十五人增加到七千七百四十八人。
- 一九二一年 国会通过移民定额法案。
- 一九二三年 这是中国青年不受条件限制，以学生身份来美求学的最后一年。因为随后移民法规定，凡来美就学者，须具备获准入学的证件、足够的学费及毕业后回国旅费等条件。
- 一九二四年 中国人来美人数量(除劳工外)有六千九百九十二人，为一八八四年以来最高的一年。
- 一九二五年 从一八九二到一九二五年，中国劳工及非法来美而被禁止入境的人数达六千三百二十七人。

- 一九二八年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美国船只上出生的婴儿，如其父母为中国人，就不能认为该婴儿是美国公民。这显然与美国的传统习惯相抵触。一八七二年，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对同样案件的裁决中，凡在航行于公海上的美国船只上所生婴儿，均认为是美国公民。
- 一九二九年 二月，南京政府颁布新国籍法，第十一款规定，年满二十岁的中国人欲取得外国籍者，须经内政部准许其本人放弃中国籍。据此，中国公民通过归化取得美国公民资格，如未经中国政府事先准许其放弃中国籍者，则认为持有双重国籍。
- 一九三一年 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东三省，激起海外及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愤怒，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奋起抵抗。
- 一九三四年 从一九二四年移民法通过后，十年来中国外交使节、教师、连同其家属来美者不到一百人。
-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日，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在美中国人纷纷捐款支援中国政府抵抗日本侵略。
- 一九三八年 夏威夷华裔美国人邝友良当选为当地立法机关议员。
- 一九三九年 中国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从夏威夷大学转入耶鲁大学任教，一九五二年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一九六〇年退休。
- 一九四〇年 全美二十八个城市有中国区（即唐人街）。其中有些唐人街早先由中国矿工和铁路工人建立。

逐渐放宽时期（一九四三年——）

- 一九四三年 一月，中美两国政府签订关于美国放弃治外法权

及其它在华特权的新条约。

十二月，国会通过了废除排华法及建立移民定额的法案。这个法案虽也相应提高在美中国人的地位，但实际上中国移民额与欧洲移民不能相比，每年定额只有一百零五人，仅占一九二〇年在美中国人口数的六百分之一。

一九四五年 排华法废除后，按定额移民来美的中国人每年一般不到一百人。

在美中国人的政治性组织致公党改建成洪门民治党。

一九四六年 继一九四五年战时新娘法案后，国会通过美籍华人的妻子及子女适用非定额移民来美的法案。据统计，在美九十五份外文报纸中，中文报纸有十四份。

一九四七年 随着战后中国局势的变化，中国移民激增，共有一千一百二十八人，其中大多数是非定额移民。

一九四八年 一九三八年当选夏威夷议员的华裔邝友良被提升为州众议院议长。

一九四九年 来美中国人有二千四百九十人。据调查，这一学年中国学生在大专院校就读的有三千九百十四人，为历届最高的一年。

一九五〇年 据人口调查，本年在美中国人总数达十五万零五人。

一九五四年 本年来美中国人有二千七百四十七人。

八月五日，由于人民中国参加朝鲜战争，美国政府颁布法令，禁止在美中国学者及科技人员离开美国。二十六名中国学生向美总统呼吁撤销这一禁

令。

一九五五年 据调查，在美国只有十六个城市中有唐人街。十五年中减少了十二处。

七十六名中国知识分子离美返回中国大陆。

一九五七年 在美中国学者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一九五八年 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吴健雄博士，因在参与杨振宁和李政道两教授发现宇宙新规律的实验中作出的重要贡献，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物理学荣誉博士学位。这是该校第一次把这个学位授予女学者。

一九五九年 夏威夷州众议院议长、华裔美人邝友良，当选为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也是该州第一个参议员。

一九六〇年 据人口调查，本年在美中国人总数为二十三万七千二百九十二人，其中在美国出生的占百分之六十。

从一九四三年废除排华法以来到本年止，中国人申请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有二万二千三百二十九人。

到本年底，全国六十五份外文日报中，中文的日报减少到十一份。

一九六一年 据报告，一千三百名中国人在美国八十八所大专院校担任行政及教职，其中有的担任教务长，有的是系主任。

一九六四年 到本年为止的二十年中，在美国的中国人成为美国公民的有三万七千人。

一九六五年 十月三日，国会通过新的国籍法和更加放宽移民

额的法案。根据新法案，废除了原来按国籍和血统的移民限额，确立了先来先办的原则。美国的国籍不再以不同国籍和种族为基础，而以出生地为原则。中国的移民额不再是一百零五名，可能每年有二万名。

一九六六年 随着国会放宽移民新法案的制定，本年上半年来美的中国人达一万七千五百零八人，其中三千多人来自香港。原来暂居美国转而取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近一万人。

一九六七年 到本年上半年，又有二万五千多中国人来到美国。同期暂居美国申请永久居留的有一万一千多人。

一九六八年 到本年上半年止，来美中国人计一万六千四百三十四人，同期暂居的转永久居留的有四千九百二十七人。

一九六九年 到本年上半年止，有二万零八百九十三名中国人来美，其中，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权的有三千九百八十人。

一九七〇年 据本年人口调查，在美中国人总计有四十三万五千零六十二人。

一九七一年 到本年上半年来美的中国人有一万七千六百二十二。

本学年到美就读的外国学生有十四万四千七百零八人，其中由亚洲各国、地区来美的中国血统的学生有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五人。

一九七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新纪元，轰动了全美的中国人，二月二十五日，由尼克松总统和中国周恩来总理签订的中

美上海公报，使热情达到了高潮。在美中国人，特别是倾向台湾的一些商人，对美国政策突如其来的转变感到惊慌失措。

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访问在稳步增长。国务院估计，有一千五百到二千美国人访问中国，其中许多是原籍中国的学者，包括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

十月二十七日，一九六五年新移民法和国籍法进一步修正。凡已归化的美国公民须符合下列条款中的一条，才能保留美国籍：（1）年龄在十四岁到二十八岁之间来到美国，在美连续居住不少于两年者。（2）外国出生的父亲或母亲在归化美国时，其子女年龄在十八岁以下并在十八岁内取得永久居留权者（父或母暂时离开美国不到六十天，不算连续居住中断）。这条款适用所有原不同国籍和不同种族，包括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

在美外文报纸一般在减少，但在纽约的中文日报已增到六种，即《美洲日报》、《联合日报》、《华美日报》、《中国时报》、《星岛日报》及一九七二年出版的《中国邮报》。旧金山和夏威夷各有两种，它们是《少年中国》、《金山日报》以及《联合新报》、《新中国日报》。此外，有些大城市还出版中文的周刊、月报及其它期刊。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纽约出版的《中国人在美国》一书 杰文译）

修昔底德

(约公元前四五六至前四〇四年)

修昔底德一向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象我们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生平事迹所知甚少一样，我们对他的生平事迹也知道得很少。修昔底德是雅典的一位公民，晚于希罗多德约二、三十年。他是贵族，出生在色雷斯地区的显贵之家，同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泰亚得^①有姻亲关系。我们可以设想，他早年曾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他的素养是准备在军政界供职的。公元前四三一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修昔底德也许只有二十五岁。公元前四二四年，他被任命为将军，负责指挥在色雷斯地区作战的雅典部队。由于安菲波利斯城^②沦于敌手，他被革职并遭到放逐。这种被迫的退隐，却使他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得以旅行各地，亲眼观察那些惊心动魄的大事，并专心致志地来写他的这部《历史》。公元前四〇四年雅典陷落之后不久，他就死了。

修昔底德早就立志写他这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自己

^① 米泰亚得(约公元前540—前489年)，雅典贵族政治家和军事家。公元前490年，当波斯军侵入希腊时，他力主抗战，当选为雅典的十将军之一。在马拉松战役中，他率领希腊人打败了波斯侵略军。——译者

^② 安菲波利斯是马其顿滨海地区的重镇，希腊北部的交通枢纽。公元前424年，安菲波利斯被斯巴达军围攻甚急，修昔底德率军往援，兵未至而城已陷，因此得罪。——译者

说道：“从这场战争爆发之日起，我便认为这将是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比以前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值得记载下来。”他辨明酿成这场战争的原因，说哪些是表面的，哪些是根本的，并且指出：酿成这场战争的“真正的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扩张，以及这种扩张在拉西达蒙^①所引起的惊慌恐惧之情”。但尽管如此，他却和希罗多德不一样，并不特别着重追溯那些原因。他的主要目的，不在写这场战争的原因，而在写这场战争的教训。他希望他这部《历史》能有益于人。“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将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由于怀着这样一个目的，修昔底德所写的史书就截然不同于希罗多德所写的史书。希罗多德所写的史书包罗万象，内容庞杂；修昔底德的史书则是叙事集中，主题鲜明。希罗多德往往不厌其详地说些离题话；修昔底德则是严格限定了他的主题范围。

修昔底德的主旨，还不止是描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是民主制的、帝国主义的雅典同寡头政治的、军国主义的斯巴达之间一场生死存亡的大搏斗），而是更多偏重于分析双方的政治形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修昔底德是“政治史之父”。只是在政治领域中，他才认清了人类进行活动的意义。他认为历史发展是循环的。他以为，懂得了政治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在社会上、军事上所造成的后果，他便可以掌握住人类一切行为的根本动机。而人类的这些根本动机，便是造成历史循环的原因^②。于是，他就竭力

① 斯巴达所统治的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地区。——译者

② 修昔底德是反动的历史循环论者。他站在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把奴隶主贵族的阶级属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并荒谬地认为：“人性”不变，所以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循环的。——译者

集中心思来写那些“重大”而且足以说明问题的事件。他说：“我相信，我从事实证据中所得出来的那些结论，应该是完全可靠的。”因此，那些关于远方异域的记载，那些关于其他民族的奇闻轶事、神话或宗教传说，以及一切同他这个主题没有直接关系的材料，他都尽可能地不予采用。

修昔底德还有一点也背离了希罗多德的做法，他集中精力写最近的事，即他所写的纯粹是当代史。他写道：他的结论“既不会受到诗人那些华丽诗篇的影响，……也不会受到那些文词虽美但有失真实的编年史家的文章的影响。他们所谈的那些东西是没有史实根据的。它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绝大部分均已失去史料价值，只好被归入神话传说之列了。”因此，在他所引用的史料证据中，口头传说就没有任何地位。他写道：把口头传说当做史料证据，其弊病是使人们“轻信各式各样的传说，以讹传讹，而根本不加以任何考证”。修昔底德所赖以写作的材料，主要都是那些目击其事的人所提供的事实材料。而且对那些目击其事的人所提供的材料，他还要反复加以核对，并同旁人的说法相对照，以求得到印证。他按照在引用史料证据时所必须遵循的严格规定，用批判的、理智的态度来对待他所能得到的材料。诚然，作为一位史学家，他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为信史实录确立了严格的标准。而由于他是专心致志地只写当代史，范围不广，也就比较容易地达到了信史实录的要求。他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

叙事精确，条理连贯，集中精力写当代史而尤其着重写当代的政事，这些就是修昔底德的素志和目标。循着这样的素志和

目标,他写了一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这部史书的特点是:考证精确,分析得当,取材谨严,首尾一贯,而在叙述政治事件时有一种深厚的道义感和精神力量。他认为要对远古的事或远方异域的事进行历史考察是不可能的,因此避而不谈。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就摒弃了希罗多德的那一条路,而只注重当代史。但我们会同意他自己所说的那句话,他的历史著作“不是要赢得一时的赞赏,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宝籍”。

(译自一九七二年纽约出版的彼得·盖伊等所编的《史学家的业绩》第一卷 郭圣铭译)

《末日》

〔美〕《号角》周刊

……尼克松在白宫大厅里踱来踱去，向早期总统们的肖像挥手告别……他的助手们防止了他在酩酊大醉、自暴自弃的消沉之中毁灭世界……两个勇气十足的新闻记者探查出行政当局隐藏最深的秘密，使之暴露在全国面前……

此类情节和镜头，随着最近《末日》一书的印行和影片《全是总统手下人》的上映而变得家喻户晓。这部书和这部影片，均以《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专栏作家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的作品为底本。

书和影片揭露了最上层资产阶级的腐化。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着手肆无忌惮地暴露出他们自己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动机是大有加以了解的必要的。

影片和书籍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一个集团正企图使用宣传手段和文化工具来对另一个集团进行讨伐。同时，他们企图在公众中散布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有可能进行改革这样一种印象。

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在《华盛顿邮报》工作，该报以其自由派立场的社论和对“缓和”的支持而著名。《邮报》的老板凯瑟琳·格雷厄姆，同肯尼迪和洛克菲勒家族过从甚密；《邮报》及其附属产业《新闻周刊》杂志，都被用来宣传统治阶级中的这个特定集团的观点和利益。连载《末日》一书最耸人听闻的几期《新闻周刊》发行了一千二百多万份。《华盛顿邮报》则派出了一批该报的编辑和采访人员去帮助《全是总统手下人》影片的导演。格雷厄姆本人还撰写了连篇累牍的社论，为影片出谋划策。

《末日》的攻讦，使人们觉得尼克松政府是如此无法无天、穷凶极恶，简

真是空前绝后。这本书从对尼克松的自大狂，他的种族偏见，他的贪赃枉法，他的智力低下等的详细描绘中，向读者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这一切太不正常了，只能是尼克松个人造成的，而不是把他送上总统宝座的这个制度造成的。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不仅转移了人们对产生水门事件的这个制度的注意力，而且也为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之类开脱，而他们的经历同样充斥着腐败、暗杀和“卑鄙的手段”。

另一方面，《全是总统手下人》是为了给人上“这个制度行得通”的课而构思的。它使人感到，锐意改革的、热爱正义和民主的新闻记者和其他人们终将战胜这个制度中的任何邪恶。这不单是《华盛顿邮报》，而且也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广告。水门事件已被用来掩饰政府腐败的阶级性质了。

这本书和这部影片给尼克松的政治棺材敲上了最后的钉子。当美国统治阶级内部陷于激烈争吵——尤其是在“缓和”问题和对苏战略问题上——的时候，它们的问世并非偶然。在同苏联的对抗中，尼克松行政当局比起现在福特-洛克菲勒这一帮来，不那么息事宁人，而且这个矛盾还触发了当前统治阶级中更多的辩论。

在《末日》引起的争议中，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为他们的新闻工作和他们对尼克松私人生活的刺探而辩解。他们每回接受访问，都声称：“我们不是宣传者。我们不过是努力报道事实的新闻记者。”

然而他们是宣传者。他们在再现有关尼克松的“事实”和揭发他那个政权腐化的时候，是在宣传“这个制度行得通”的观点，是在支持这个同凯瑟琳·格雷厄姆及其报纸密切相关的剥削和压迫的制度。

（译自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七日美国《号角》周刊
福建三明钢铁厂青年工人何亮亮译）

美国大学中研究苏联问题 的一些机构

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 一九四六年创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美国政府和私人基金会资助。有十二名专业研究人员，十名副研究员，三名研究员以及非专业的辅助人员。

主要研究：俄国和苏联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事务，包括研究苏联国内外政策的相互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科学对思想意识的影响，十九世纪俄国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对苏维埃文学艺术的政治控制的变化和继续，俄国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关系，苏联特权阶层的组成和特征以及苏联社会中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此外，还承担本校研究生有关上述问题的指导和研究训练。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书、专辑和博士论文集上发表。出版物有：《俄国研究所论文集》，《俄国研究所论文特辑》（以上都是不定期刊物）和《研究报告和出版物》（两年刊）。经常为本校学生举行学术讨论会、报告会和专题讲座，每两周举行一次跨学科讨论会。

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 一九四八年创办。哈佛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和基金会补助金资助。有十七名专业研究人员，三十九名副研究员，十七名研究生助教。

主要研究：苏联及有关领域，包括苏联经济、政府和社会结构的跨学科研究，共产党和东欧，采用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苏联和共产党社会，力图对所研究的题目采用比较的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研究成果在书和科学杂志上发表。出版不定期刊物《俄国研究中心丛刊》。每月举行两次研究人员讨论会，这种讨论会对校内苏联课程的教师和

学生、来访的同事和邀请的来客开放。

普林斯顿大学俄国研究计划 一九六三年制订。普林斯顿大学跨系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经费来自大学、一些基金会和私人赠款。研究人员由各系教师担任。

主要研究：俄罗斯和苏联文化的语言和历史，着重研究俄国和苏联的组织机构、制度、经济、历史、政策和社会学等。负责校内大学生和研究生有关俄国研究的指导。

研究成果以个人名义在专业杂志、专辑和科研项目报告上发表。定期举行校内外学者俄国研究的学术报告会。

威斯康星大学俄罗斯地区研究计划 一九五九年制订。是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的研究活动。经费由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有十九名专业研究人员和两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俄罗斯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对外政策、政府、历史、法律和政治，还研究斯拉夫语言学、语言和文学。培养研究生，为担任大学教师、政府工作人员、新闻记者、图书馆工作者以及类似职业的大学生提供研究训练。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书上发表。每年举行一系列研究俄国问题的著名学者专家的公开讲座和讨论会。

印第安纳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所 一九五三年创办。印第安纳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和基金会补助金资助。有四十四名专业研究人员，五名助教，两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俄国和东欧地区的经济学，教育学，民间传说，地理，政府，历史，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和文学，音乐和社会学。承担研究生研究上述科目的指导。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专辑上发表。出版不定期刊物《俄国和东欧丛刊》。举办所外专家的讲座和不定期的学术讨论会。

约翰·卡罗尔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所 一九六一年创办。约翰·卡罗尔大学的组成部门，但有其自己的学术管理委员会和共有的顾问委员会。经费由大学、基金会和个人资助。有八名专业研究人员，二名专业辅助人员，一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和苏联帝国一起的各国状况。搜集和介绍有关苏联殖民地实践的资料。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专辑上发表。每年举行有关美苏关系方面的公开讨论会和教师、研究生的实习讨论会。有一个研究工作室，备有若干苏联出版的报刊杂志。

斯坦福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六七年创办。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在一个研究俄国和东欧问题的教员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经费由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人员来自大学各系。

主要研究：东欧各国政治和社会变化的相互比较研究，包括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俄国各政党的形成，一九〇五至一九一四年的俄国外交以及东欧的对外关系，还研究俄语教学电子计算机化的问题。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书上发表。举行有关俄国和东欧各国重大问题的年会，定期举行专题学术讨论会。

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五八年创办。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文理学院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资助。有一名专业研究人员，四名研究助理，四十名由学校教师担任的专业辅助人员，一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同研究俄国和东欧有关的所有学科。促进、帮助和协调俄国和东欧问题的研究和训练，推动个别教师的研究工作，组织国际会议，供应讲稿，担任一部分研究生的研究辅导，参加同东欧各国的学术交流计划。

伊利诺斯大学俄国和东欧中心 一九五九年创办。伊利诺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以前称俄语地区研究中心。经费由大学、美国政府和一笔基金会的补助金资助。有二十四名专业研究人员，二十二名专业辅助人

员,十二名技术员,六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包括研究人员个别从事于历史、政治学、地理、人类学、语言学、图书馆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文学的研究。担任本校研究生和大学生的俄语和其他斯拉夫语的教学工作。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一般杂志上发表。定期举行有关俄语和地区为主题的讲座,并主办校内的俄罗斯俱乐部。有一所藏有十八万卷斯拉夫语图书和六百种俄语报刊的图书馆。

密执安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六一年创办。密执安大学文学、科学、艺术学院的一个组成部门,前称俄罗斯研究中心。经费由大学和福特基金会资助。有三十二名专业研究人员,以及非专业辅助人员。

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包括人类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地理、历史、法律、政治学以及斯拉夫语言和文学的研究。还提出研究生的研究计划,提出为充任有俄国和东欧知识的教师、政府工作人员和商人的大学生培养计划。

研究成果在专辑和专业杂志上发表。

圣玛丽大学苏联和东欧研究计划 一九五三年制订。圣玛丽大学国际研究所的研究活动。经费由大学和基金会资助。有七名专业研究人员,四名专业辅助人员,一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包括研究苏联的政策和苏联势力范围以外特别涉及到非洲的活动方法,苏联经济及其对苏联国外活动的影响。还承担校内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和书上发表。举办公开讲座和专题讨论会。有一所收藏一万卷有关苏联和东欧的书籍的图书馆。

南伊利诺斯大学俄国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六八年创办。南伊利诺斯大学交通学院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负担。有四名专业研究人员,两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苏联和东欧的表演艺术。

研究成果出版书籍。出版季刊《公报》。

加利福尼亚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五七年创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和研究补助金资助。人员来自本校教师。

主要研究：斯拉夫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历史、政治、社会学、语言和文学。

研究成果在专业杂志、书、专辑上发表。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和专家讨论会促进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常常邀请外来短期讲学的学者参加）交流思想，互通学术情报。

堪萨斯大学斯拉夫和东欧研究中心 一九六〇年创办。堪萨斯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在跨系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经费由大学、美国政府和研究补助金资助。有二十六名专业研究人员，三名专业辅助人员，八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斯拉夫语和地区研究，包括经济学、地理、历史、音乐史、法律、哲学、政治学，收音机——电视机——电影，斯拉夫语言和文学（俄文、波兰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古老的教会斯拉夫文）以及戏剧。参加校内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计划。

研究成果在书和专业杂志上发表。出版物有《堪萨斯斯拉夫季刊》和《堪萨斯斯拉夫丛刊》。

宾夕法尼亚大学斯拉夫语和地区中心 一九五九年创办。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和美国政府资助。有十五名专业研究人员，以及由校内教职员担任的专业辅助人员和非专业人员。

主要研究：斯拉夫地区的语言和文学，俄国史，苏联政府和对外政策，俄国和苏联教育学以及苏联经济学。

研究成果由研究人员个别发表。图书馆的资料由斯拉夫目录学家管理。

范德比尔特大学斯拉夫语和地区中心 一九六一年创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一九六五年前称俄罗斯语言和地区中心。经费由大学和美国政府资助。有八名专业研究人员，四名专业辅助人员，四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斯拉夫语和地区研究。还承担校内这方面的教学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中东欧研究所 一九六四年创办。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的一个组成部门。它是一九五四年学院开始实行的中东欧研究计划的产物。经费由福特基金会资助。有二十名专业研究人员，九名专业辅助人员，三名其他人员。

主要研究：中东欧的文化，包括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等国的文化，包括研究巴尔干各民族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政治和制度的发展状况，南方斯拉夫的经济计划，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以及南方斯拉夫的文学和语言学。收编中东欧研究的图书目录和手册。承担研究生的中东欧历史、政治发展、人种学、经济学、文学和语言等博士论文的指导、研究训练和督促。

研究成果在专辑、书和博士论文集上发表。出版物有《中东欧研究》和《研究通讯》。有一所十三万卷藏书的图书馆。

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国研究所 一九四六年创办。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组成部门。经费由大学和基金会资助。有六十名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一些专业和非专业的辅助人员。

主要研究：东亚、俄国、东欧和南亚的人类学、经济学、地理、历史、法律、文学、语言学、哲学和政治学等。

研究成果在书和专业杂志上发表。有一所收藏二十万册有关中国、日本、朝鲜、蒙古、西藏、泰国、印度、俄国和东欧书籍的图书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美国出版的阿尔奇·M·帕
尔默编《研究中心录》（第四版） 大纲译）